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罗斯福传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 第一部：赫德逊河畔的望族少年

纽约州赫德逊河河谷，土地肥沃、林木繁茂、交通便利。在距纽约市区约100英里处的河谷东岸，有一大片山岭逶迤的高地。高地的一个小山丘上座落着一幢气势不凡的宽敞楼房，这就是海德公园村罗斯福家族的宅第。1882年1月30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出生于此。他就是后来美国的第32任总统。

### 族谱与家世

赫德逊河是17世纪初以启发现者、英国航海探险家亨利·赫德逊而命名的河流。它的源头可上溯到毗邻加拿大的纽约州北端，全长近500英里，在流经奥尔巴尼后蜿蜒南下，纵贯纽约市区，注入大西洋。17世纪初，荷兰移民纷纷沿着赫德逊河在河谷两岸定居，建立了新尼德兰殖民地。大约在1643年前后，有一位叫克拉斯·马腾森·范·罗森菲尔德的荷兰人随着移民潮在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市）登陆，然后在附近定居下来。

随着岁月的泼洗，故乡荷兰那个濒海的罗森菲尔德小伸的铁轨——在仕途上与“总统叔叔”比肩看齐——不期而至并从此横亘在他的意识深处。果然，此后罗斯福的政治旅程与长他24岁的特德叔叔如出一辙——纽约州议员、助理海军部长、纽约州州长以至美国总统。

然而，个体生命的驿站却呈现出迥异于特德叔叔的轨迹与景观。罗斯福并没有受到想象中的荫庇。他凭藉的是自己的进取、抗争……甚至苦斗，以及由顽强隐忍和深沉性格支撑起来的自信，亦即对自己的事业抱有的沉静而绝对的自信——他39岁时下肢瘫痪并从此终生与支架或轮椅为伴，病因是小儿麻痹症。他把这飞来的一击当成冥冥中早已预定的命运之约。生理残疾往往使人乖戾、愤世，罗斯福却以健全的心理平衡与防卫机制避免了这种可能性；痛苦也使人宽容、旷达，微温的理智和高度的自尊使他在最令人沮丧的诸事不顺的促狭环境中，也能发现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点滴变通的可能性，这种柔韧而绵长的信念使他永远有梦，政治明星的职业末日感也随之被消解。此后在他生命中的各个时段里，他遭遇了难以数计的反对派和强硬的对手，他们对他的各个方面进行过非议和责难，但都绝口不言他曾经或者会绝望。

在长达8年的蛰伏其中，他调整和校正了表达生存和生命意志的方式。他当律师，表现平平；投身商海，更是一事无成。但当他坐着轮椅进驻帝国州长官邸时，浮躁凌厉变成了圆熟通达，精气内敛取代了锋芒毕露。他了解国事民瘼，洞悉政治行情。他学会了一个人在竭力要飞上天的时候如何在地上行走的本领，对政治角逐场上那些极具法度的攻守进退的微妙之处更是了然于胸。他积累着实力和厚度，醉心于植物学和养马，成了达切斯县一名优裕而悠闲的乡绅。在南北战争前夕，年近古稀的艾萨克成为废奴运动的支持者，他的住所一度成为南方黑奴逃往加拿大的“地下铁路”交通站。

艾萨克·罗斯福第二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1828—1900）即富兰克林的父亲，1828年生于海德公园。1847年毕业于联邦学院。他青年时代思想激进，是个富于朝气，崇尚自由的浪漫主义者。1848年，

20岁的詹姆斯去欧洲旅行，正值加里波第的“红衫军”为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控制而苦斗之时，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同情弱者和正义者的行列，在“红衫军”中干了一个月。他回国后即进入哈佛大学，并于1852年在哈佛法学院完成了学业。翌年，他同丽贝卡·豪兰结婚。一年后儿子降临，夫妇俩决定打破罗斯福家族惯用的交替命名法，给儿子起名罗西·罗斯福。詹姆斯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还在赫德逊河流域拥有大约200公顷的土地。他平易近人，热爱生活，钟情于充满田园风光的乡绅生活。但他并没有整日沉溺于海德公园的天伦之乐中，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在纽约市区从事他的工商业活动。

-----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生性豪爽、具有浪漫气质的詹姆斯·罗斯福似乎一生都醉心于做大生意。他主要投资经营煤矿业和运输业，担任了德拉韦尔——赫德逊运河公司的副董事长和几家较小的运输公司的董事长。他把从事运输业所获的大部分收益用于投资经营无烟煤的开采，结果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这个几乎垄断着沥青矿开采的巨大烟煤联合企业濒于破产，詹姆斯和他的伙伴们被愤怒的股东赶出了经理室，从此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他和伙伴们还准备建立一个控股公司，把南方的铁路网络全部垄断起来，这一冒险事业又因周期性的经济萧条而告吹。接二连三的受挫并没有使他们气馁，他们开始策划更大的生意。他们于1887年成立了尼加拉瓜海洋运河公司，计划开凿一条横贯尼加拉瓜的大运河。詹姆斯担任了该公司的经理，作为一名民主党人，他曾资助过克利夫兰的再度竞选，两人私交不错。他设法让克利夫兰总统批准了合股经营法案，随即筹集了600万美元资本投入初期营运，但1893年的大萧条又一次冲垮了公司。即令如此，詹姆斯也没有让外面世界的纷扰殃及海德公园平静的家庭生活，他总是以惊人的意志力将自己的生活分成内外两个似乎永不相交的世界。

1876年丽贝卡·豪兰去世，詹姆斯异常伤心。从此，海德公园的美丽夜晚不免显得有些冷清、单调。好在詹姆斯生性乐观，热爱生活。儿子罗西于次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哥伦比亚法学院，随后又娶了艾斯特夫人的女儿海伦·艾斯特为妻。罗西为人随和，聪敏机智，又有外交才能，发展前途不可限量。詹姆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善于自我调节，过着平静而有趣的生活。

1880年春，詹姆斯在奥伊斯特湾支系老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总统的父亲)家中的一个小晚宴上遇见了美丽修长的萨拉·德拉诺。机智风趣、温文尔雅、健康且显年轻的詹姆斯立即博得了萨拉小姐的欢心。两人几乎是一见钟情。詹姆斯不失时机地果断向她求婚，果然如愿以偿。1880年10月，两人在萨拉·德拉诺的家园阿尔戈纳克——一个与海德公园隔河相望、两地相距仅20英里的庄园举行了婚礼。在经历了几个月风光旖旎的欧陆之旅后，两人回到了海德公园舒适的家。萨拉带来了100多万美元的嫁妆。这一年詹姆斯52岁，萨拉26岁，正好与罗西同年。

萨拉·德拉诺与詹姆斯·罗斯福算起来还是第6代的表亲。德拉诺家族的成员常常喜欢把他们的家世一直追溯到征服者威廉(一世)和一位格兰特总统任内的内阁部长那里，他们以作为1162年抵达普利茅斯的菲利

普·德·拉诺依的后代而自豪。德拉诺家族的人很少涉足政界，他们大多是生活优裕的商人、船主、企业家或乡绅。萨拉的父亲沃伦·德拉诺年轻时常在中国南部沿海一带做生意。他在经营对华贸易中赚了不少钱，1857年的经济危机使他侵蚀了大部分财产，于是沃伦又到中国去挽回损失。他先做鸦平生意，后做茶叶生意，不久即发了大财。然后他决定把全家带到中国去。德拉诺一家在经过了四个月的海上航行后，到达香港，住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叫做“玫瑰山”的庄园中。沃伦不让孩子们学中国语言，萨拉和兄妹们只乘船到过广州。1942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史迪威等人谈到他同中国的渊源时说道：“我个人同中国也有瓜葛，我的外公到过那里。1829年他到过汕头、广州，甚至还去过汉口。他生意兴隆，赚了100多万美元。回国后他用这笔钱投资修筑西部铁路，可是在随后的8年中全赔光了。1856年他只一次去中国，在整个南北战争期间他都呆在那里，于是又赚了百万美元。当时美国正在打内战，医院急需鸦片。……哈哈。”罗斯福在这里只谈对华贸易，而对外公的鸦平生意讳莫若深。沃伦和家人在香港只住了两年，就带着妻子、几个孩子和赚足的钱财回到美国，定居在赫德逊河西岸的庄园，成为这一带知名的上流社会家庭。萨拉·德拉诺自幼生活在优雅舒适的环境中，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她雍容华贵、落落大方，十分熟悉美国上流社会的生活。

-----

《史迪威文集》，纽约1948年版，第251页。

在婚后的第3年，确切地说，在1882年1月30日上午8时3刻，詹姆斯和萨拉的爱情结晶降临了。临产时母子均险遭不测。波基普西市的爱德华·帕克医生给萨拉施用了过量的氯仿麻醉，萨拉不省人事，婴儿生下因昏迷过度而脸色发青，连打几下臀部都没有哭声，帕克医生只得用人工呼吸，方使婴儿苏醒过来。詹姆斯在当晚的日记中记道：“我的萨拉生下一个胖胖的男孩，非常可爱，体重10磅，不算衣服。”

詹姆斯和萨拉为儿子的取名争执不下。父亲给他取名艾萨克，母亲坚决反对，要取名为沃伦，只因她哥哥刚刚失去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幼儿。直到7周后，婴儿在海德公园村的小教堂洗礼时，才被命名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与他的一个舅舅富兰克林·休斯·德拉诺同名。

## 海德公园的童年

詹姆斯·罗斯福晚年喜得贵子，自然视之为掌上明珠，萨拉对儿子也十分疼爱。

对于年幼的富兰克林来说，这幢舒适的住宅和海德公园就是他的整个世界：共有三层的住宅楼宽敞明亮，四周环绕着优质护墙板和狭长的阳台，房顶上有一个可以眺望大海的平台，楼房正面配有一条长长的带扶手栏杆的门廊，正对着大门的马路西边伫立着一排排爬满长春藤的高大石柱。围绕着整幢楼房的是修剪整齐的花坛、草坪和各种高大的树木，有铁杉树、榆树、槭树、栗子树、水青冈树等。楼房右边有一个暖房和被高大的铁杉树密密地围了起来的玫瑰园，左边有冰窖、谷仓、厩棚、葡萄园。小富兰克林的活动室设在三楼，透过百叶窗可以看见如茵的青草漫过远处低缓的山岗，成群的牛羊，以及詹姆斯亲自培育出来的良种马正缓步在草地和树丛间，稍远处是一片片翻耕的田地和整齐的牧场。小富兰克林常被抱上楼顶平台乘凉。从这

里放眼望去，赫德逊河的美丽景致一览无余。平静的水面上白帆点点，更远处是湛蓝的大海。

整个赫德逊河谷肥沃的土地只归纽约州十几家名门望族拥有。罗斯福家的邻居大多是实业界的头面人物，范德比尔特、罗杰斯、艾斯特、奥格顿就住在附近。小富兰克林常和这几家的孩子们嬉戏玩耍。同父异母的罗西大哥大他28岁，常给予他父亲般的呵护，他不久就去了维也纳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圆了他的外交家之梦。他的儿子塔迪比富兰克林大两岁。楼房和庄园里还住有家庭教师、厨师、保姆、女仆、车夫、马僮、雇工，出入他家的大都是同罗斯福家族和德拉诺家族关系密切的人。丽贝卡去世后一度冷清的海德公园又开始热闹起来，富兰克林从小就没有感到过孤单。

萨拉在富兰克林出世后不久就开始记日志，20年来从未停止。儿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毫无遗漏地记录在案，甚至儿子穿过的衬衣、鞋子、小袜子，以及稍大些时的信件、考试卷，都给她整整齐齐地保存了下来。今天，人们正是通过这厚厚十几本密密麻麻的日记和一大摞早年的信件，才得以更为清晰地看到罗斯福早年的生活情景。

小富兰克林长着碧蓝的大眼睛，鼻梁挺拔端正，一头金色的卷发，穿着德拉诺家族沿袭下来的苏格兰式横褶短裙和黑天鹅绒童装，显得英俊、神气，很招人喜爱。"我的儿子是德拉诺家族的人，根本不是罗斯福家族的人。"萨拉经常自豪地对人这样说。富兰克林2岁半时，有一天，一家围在餐桌边吃饭，他把盛牛奶的玻璃杯边沿咬掉了一大块，萨拉立即将他推出餐厅，从他嘴里掏出碎玻璃片，并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通。"当我觉得他已经认错了才让他回到餐桌上来。可是一会儿，他又拿起刚换上来的高脚玻璃杯，闪着调皮的目光假装再去咬它。"富兰克林！你的顺从哪里去了？"富兰克林庄严地答道："我的顺从已经上楼去了。"

13

年幼的富兰克林眼中的父亲和蔼可亲，宛如一个知心的导师和游伴，对他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简直无所不知。他举止文雅，留着满脸络腮胡子，穿着带马刺的鞋子，头戴圆顶硬礼帽，手拿短柄马鞭，并且手头总有500美金。这一切都对儿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所以他总爱找爸爸玩。在整个童年时代，罗斯福同父母呆在一起的时间要大大多于同周围孩子们玩的时间。一到夏天，他就随着父亲去巡视庄园、骑马、骑自行车、打猎，在赫德逊河边钓鱼、游泳、划船，每天步行到村口取回邮件，那里除了近期报纸外，还有他爱看的儿童画册和画报。

他喜欢从楼房前的斜坡向下滑着玩，带着弓箭在树林间漫游，去草地和丛林间摘草莓。

入冬，他和伙伴们跑到赫德逊河畔去观看大人们把大块大块的冰从河里拉上岸来，然后一路吆喝着运回各自家的冰窖。他喜欢穿着簇新的雪鞋和父亲去河面上溜冰、划冰船、滑雪橇。

有一只雪橇据说还是当年俄国人专为拿破仑第三制作的，詹姆斯在1861年从巴黎购买后运回美国。

富兰克林从小就喜爱动物。在节日和他的生日里，他收到父母送给他的礼物：苏格兰小矮马和良种长毛猎狗。父母在他高兴之余告诉他，这些动物今后将完全由他自己照管，包括喂养矮马。他拿着父亲送给他的口径猎枪捕鸟，并恪守诺言，对赫德逊河流域特有的鸟类每种只捕一只。如此坚持

不懈的努力，不仅使他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小射手，也使他收藏的300余种达切斯县的鸟类标本迄今仍属于最丰富之列。可见，罗斯福从小就是一个肯下功夫的收藏家。鸟类标本、邮票、航船模型和植物标本使他乐此不疲，并皆有所成。他从这些爱好中获得了无法替代的乐趣和宝贵的知识。而对大海、船舶和海上航行的热爱，则成了他一生难解的情结。

童年的罗斯福在生活中受到了严格而又充满爱抚的教导和训练。他到5岁时才开始自己穿衣服。9岁时才被允许自己洗澡。他每天都要花一定时间来完成父母为他制定的各项训练计划。萨拉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并不让孩子做大量没必要做的事，虽说那些于他有益的规定必须严格遵守。我们从不仅仅是为了严厉而严厉，实际上，我们暗中也感到骄傲，因为富兰克林似乎天生就不需要那样的约束。”詹姆斯夫妇从小就为儿子的成长规划了一个并不富于弹性的框架，好在他们并没有刻板地强迫儿子接受这种塑造。父亲有意识地将他培养成一名十足海德公园气派的美国绅士。母亲更溺爱儿子一些，似乎一心想让儿子永远地和自己依偎在海德公园这个宁静、安全、没有险恶挑战的世外桃源中。她小心谨慎地尽量不让儿子感知到这个世界上那些层出不穷的忧愁、苦难及其他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似乎并没有刻意培养他的意志力和独立性格。詹姆斯深信，只要让富兰克林的脑海里时刻充满着美好的事物，心灵中不期而至的高尚境界就能自觉地抵御粗俗、懦弱和邪恶，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尽量让健康有益的自由活动充实他的身心。他是父母美满婚姻的独生子，这个家庭一切都是以他为中心。没有兄弟姐妹同他争宠，同他抢夺玩具或者带他走出父母的安乐窝去过学校生活和上运动场。这样的环境培养了他的优越感以及基于自信的平静性格。多年以后，心力交瘁的罗斯福坐在白宫里不止一次地说道：“我的灵魂召唤我回到赫德逊河畔。”

在罗斯福的整个童年时代，父母总是带他到各地旅行。他们拥有一节舒适的火车包厢和一辆豪华的“蒙农”牌轿车。几乎每年夏天，他们都要去芬迪湾的坎波贝洛岛，那里属缅因州，位于帕塞马科迪海湾的入口处，濒临风急浪高的大西洋，气候潮湿、凉爽。他们在岛上买了一块约两公顷的土地，建起了一幢小别墅。詹姆斯买了一条51英尺长的“半月号”小汽艇。富兰克林对它爱得入迷。他常跟着父亲乘船出航，遨游在浩淼的海面上，并很快掌握了驾船技术，他们也常去马萨诸塞州的费尔黑文走亲访友。14岁以前，富兰克林随父母和家庭教师共去过欧洲9次，对伦敦、利物浦、巴黎、柏林和莱茵河十分熟悉。他们有时在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月，接触的尽是上流社会的家庭。年事已高的父亲在温泉疗养地度假时，富兰克林就骑着自行车来往于荷兰和法国的一些地方，或者去拜罗伊特看歌剧，到布劳恩山攀登黑森林。1939年，他对人说道：“我自幼对德国就比对法国和英国要了解得多。”

富兰克林7岁了，父母以极大的责任感和自信着手安排他的学习。海德公园村有一所学校，但他们不愿让儿子去同一般人家的子女一起去接受普通教育。一开始，富兰克林在邻居罗杰斯家的一个由德国女教师主持的小班里上学。以后，家庭女教师和私人教师被不断地请到家中来。第一位女教师莱茵哈德教富兰克林德语和小学课程，教学效果良好，可惜她后来因病住进了精神病医院。接替她的是一位来自瑞士的米尔·丁·桑托斯小姐，她每天教富兰克林6个小时的法语、英语和欧洲史。具有一些模糊的社会正义感的桑托斯小姐设法让富兰克林的思想超出了家庭规定的范围，第一次让他了解

到海德公园以外广阔世界的苦难和纷扰。在一篇关于埃及的作文里，10岁的富兰克林写道：“劳动者一无所有……国王强其他他们干重活，可给他们的东西却少得可怜！他们濒临饿死的边缘！没有衣服穿，他们大批大批地死亡！”这时的富兰克林开始阅读大量的书籍，他喜欢读马克·吐温的作品，后来他曾对人说：“如果有人喜欢我的措辞和演讲风格的话，那么这很大程度上是我长期阅读马克·吐温作品的结果，它们对我的影响比别的作家的作品都要大。”他经常独自呆在楼上，入神地阅读那些已经读了许多遍的关于海洋的寓言故事，以及那些布面装的记录19世纪初捕鲸船的航海日志。母亲也经常指导儿子读一些内容严肃的书，9岁时他就认为所有的杂志中，《科学美国人》最好，而一般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大多数孩子很难对这类杂志产生兴趣。

他记忆力不错，尤其是背词汇的能力很强。他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少有的能讲法、德两门外语的总统。

-----  
詹姆斯·D·巴伯：《总统的性格》，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8页。

14岁以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接受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基本上没有超越家庭的范围。只有一年夏天全家在欧洲旅行时，他在一所德国民族学校上过几个星期学，也算体会了一下公学的滋味。母亲萨拉严格地规范着儿子的教育进度，她似乎想在海德公园就这样地守护着儿子，直到永远。

## 格罗顿公学

主要是由于母亲萨拉割舍不下，直到1896年9月，14岁的少年罗斯福才进了寄宿学校，这就是由思迪科特·皮博迪博士创办的著名的格罗顿公学。

皮博迪出生于新英格兰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不愿随父进入工商界，而是在一个偏僻的矿区当了一名牧师。1883年，他来到格罗顿，这是位于波士顿西北40英里的一座小城镇。他在这里创办了一所公学，它有些类似于英国上流社会专门为富家贵族子弟进入名牌大学作准备的预备学校，如伊顿、哈罗公学。建校舍的地皮是富豪威廉·劳伦斯捐赠的。劳伦斯、约翰·P·摩根、菲利普斯·布鲁克斯等工商金融界的巨头是学校董事会的成员。学校收费昂贵，规模不大，仅有150名左右学生，学制6年，专收男生。不久，他就同美国那些历史悠久的贵族子弟学校一样享有盛名了。詹姆斯·罗斯福早在儿子两岁时，就为他在该校注了册。

14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设法插入了三年级。他的海德公园的邻居伙伴小埃德蒙·罗杰斯同他一起入学。他的侄子塔迪·罗斯福比他高一年级。在他班上的其他孩子中，9个来自纽约市，7个来自波士顿，2个来自费城。只要稍微看看那些姓氏，就知道他们尽属于东海岸中心城市的名门望族。据当时统计，格罗顿公学6个班级的学生中，有90%以上出身于美国上流社会家庭。

皮博迪身材高大结实，满头金发，其实单纯，是个富于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正派的北方基督徒，深受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化的托利党精神的熏染。他把为国家服务和献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强调，美国的政治必须清除污泥秽水，而格罗顿的学生要积极投身于政治，在

任何时候都不能同丑恶妥协。

## 第二部：出色的见习生

### 哈佛优等生

罗斯福从格罗顿公学毕业后，曾一度想进安那波利斯市的海军学院，将来当一名海军军官。但年迈的父亲坚决反对。他耐心地解释说，作为能够继承财产的孩子，不应该选择海军职业。因为那会远离家乡，并且生活艰苦。而学习法律，则能使一个人将来从事任何一种职业。于是罗斯福就进了哈佛大学。由于他在格罗顿的最后一年中已经学习了进哈佛所必需的16个学分以及大学新生的一些课程，因此，他在1900年9月进哈佛时，虽名列1904届新生中，但实际上是从二年级读起的。

哈佛大学位于波士顿附近查尔斯河畔的坎布里奇，创建于1636年，有着悠久的足以自豪的传统。波士顿这座号称“世界的中心”、“美国的雅典”的城市，以拥有显赫的新英格兰名门世家，雄伟的州议会大厦，别致新奇的图书馆、美术博物馆而著称于世。哈佛的一位历史学家说，波士顿是附在四周大学身上的一条“社会水蛭”，繁华的灯塔山的性感女侍总希望招待哈佛那些出身名门的“诱人的青年男子”。不过刚进大学的罗斯福还没有对女孩子产生兴趣。他只是在二年级时同作家理查德·达纳和亨利·朗费罗的孙女弗朗西丝相爱，后因母亲反对而分手。罗斯福同许多格罗顿公学的老同学一起进了哈佛，校园里随处可见来自全国各地贵族学校的毕业生。他和莱恩洛普·布朗合住在威斯特摩利大院27号的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里，地点在哈佛著名的“黄金海岸”，是一个租费昂贵的公寓和高级俱乐部集中的地区。

大学生活自由开放，格罗顿那种简片刻板的生活顿成历史。他们用三角旗、奖品、图画、标本、船舶模型、波斯地毯等把房间布置得很有气味，极富大学生的浪漫情调。

这年12月7日，罗斯福72岁的父亲因心脏病去世，给罗斯福留下了大约12万美元的遗产，也给他树立了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传统美国绅士的形象。在此后的许多年里，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夫人就成了海德公园罗斯福家族的主人，她从她父亲沃伦·德拉诺那里继承了130多万美元的遗产。丈夫去世后，她让妹妹劳拉陪她在海德公园度过了一个孤独而无聊的冬天，随即就搬到了波士顿的一套住宅，那儿距儿子的住处仅相隔几条街。她这样做，既慰藉了自己精神上的孤独和渴望与儿子亲近的需求，又使得自己得以经常照料儿子，以实现丈夫对儿子远大前程的遗愿。在萨拉的性格中，权威的思想在逐年增长，她似乎更倾向于置儿子于自己的“监护”之下。聪明的富兰克林为了不伤害母亲的感情，开始学会了迂回和规避。他在母亲的住处招待宾客，也常外出参加午餐会和郊游。他甚至担负起海德公园和坎波贝洛的一些责任。在暑期，他用尽量多的时间陪着母亲。他们像以往那样自由自在去欧洲旅行。但当萨拉提起关键性的话题——罗斯福家的生活道路，他就巧妙而机智地顾左右而言他。罗斯福并没有一味地以那种不加理睬、我



行我素的态度来表达他并非真心的反抗。

在随和与温顺的背后，罗斯福似乎开始蕴藉着一股冲破和反抗陈旧框架的力量，这些素质终于在“新政”年代的实验中表现出来。

哈佛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散漫自在，学生中来自名门世家的富家子弟占了相当比例。

一个人在社交圈和体育活动中成就的好坏往往决定了他在校园里的声誉和地位。罗斯福又一次面临着他在格罗顿时的难局：他身材瘦长，体重仅146磅，几乎没有拿手的运动项目让他出人头地。他竭尽全力，弄得伤痕累累，好不容易地当上了一年级橄榄球队的后边锋，可是，仅仅维持了两个星期，他就给撤换了下来。后来他被选为一支三流橄榄球队的领队，才总算平衡了一下他受挫后的失重心理。他还致力于划船比赛和合唱队的排练，但终究未能在正式队员中占有一席之地，好在他被选为新生合唱队的秘书，这才减轻了对他的又一次打击。然而，最大的打击来自他在社交活动中的努力。哈佛当时名目繁多而等级森严的社交俱乐部林立，那些最高级的令人向往的俱乐部大都是直接通向波士顿乃至全国上流社会的桥梁。其中最精英的受人尊敬的是“波尔柴兰”俱乐部，20多年以前他的远房堂兄西奥多·罗斯福曾是其会员，而现在不知什么原因它却将富兰克林·罗斯福拒之门外。埃莉诺·罗斯福后来认为，这次打击使罗斯福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甚至成为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之一。

当然，所有这些打击和挫折多半是因罗斯福身体上的缺陷导致的，它们与智力无关。从不一味悲观的罗斯福只好迂回到其他方面，用长岂不懈的努力所换回的成就来冲淡或者抚平心灵的创伤。罗斯福只好参加了名片稍差的旗帜俱乐部，并担任起所属图书馆的首席管理员。不久，他采纳了波士顿一位售书商的建议开始藏书，起初收藏一般关于美国的书籍，后来范围缩小到只限于军舰内容的书籍、杂志和图片。他还被选入哈佛联合图书馆委员会。随后，他又加入了其他的几个社交俱乐部。临近毕业时，他以2/3的票数当选为优等生委员会常务主席。

罗斯福是个不易在打击面前自暴自弃的人。他急切地渴望靠成功在哈佛出人头地，并藉此赢得同学和社会名流的青睐，他依旧热衷于参加课外活动。1901年，他以自己出色的表现被选为哈佛《红色校旗报》的编辑。这时，他的远房堂兄西奥多·罗斯福正如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冉冉升起在美国政坛上空。这无形中给他带来了几份额外的荣耀。1900年，还在纽约州州长任上的西奥多被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推选为麦金利的副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选前夕冲破惯例采访了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询问他打算在两党之间投谁的票。此举居然获得成功：当《红色校旗报》率先登出富兰克林采写的独家采访报道时，舆论大哗，全国各大报刊纷纷转载了这条新闻。大选前夜，他参加了由波士顿的大学生们举行的声援共和党的千人火炬游行。选举结果，麦金利——罗斯福获胜。1901年9月6日，总统麦金利遇刺，8天后身亡，西奥多·罗斯福继任为美国第26届总统。随着罗斯福这个姓氏知名度的骤然提高，富兰克林·罗斯福屡屡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自己挣得了不少荣誉和好处。他不失时机地利用一次作业任务以自己的家族为题写了一评论文。

他让母亲把海德公园家中放在祖传《圣经》旁的那些布满灰尘的家族记事本寄来。在对祖先们的活动及其关系作了一番考证和研究之后，他写道：

“如今纽约的一些有名望的荷兰家族现在除了他们的名字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他们的人数屈指可数，他们缺乏进取性和真正的民主精神。罗斯福家族朝气蓬勃并富于生命力的一个原因，或许也是主要原因，正在于他们具备了这种民主精神。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生在优越的殷实之家就可以双手插进口袋而坐享其成。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出身于富裕高贵之家的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对社会履行天职。罗斯福家族的人之所以在各个方面都能被证明是优秀的公民，正是因为他们自幼就受到了这种思想的熏陶。”随后，罗斯福在分析这些“优秀公民”何以会对美国社会作出重大贡献时，强调了荷兰人的顽强和执着——而这一切都沉淀、沿袭并展现在罗斯福家族的成员身上。显然，他在这里所谓的“真正民主精神”并非一般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而是指一种能够积极主动地通过为社区公众事业服务来获取社会地位的素质。

### 第三部：政海初航

#### 奥尔巴尼的从政训练

富兰克林·罗斯福成长于美国“进步运动”方兴未艾的世纪之交。当时，边疆业已消逝的美利坚共同体正在走向“超出凡人眼力所及范围之外的命定之乡”。伴随着工业化和物质文明方面史无前例的进展，进入帝国主义垄断时代的美国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言，“恶已随善而俱来”。

这些“恶”的突出表现有：日益勃兴的各种托拉斯和垄断组织构成了全国工商贸易活动的核心，其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滥用，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疯狂程度；社会财富分配的极为不均引起社会差别、贫富等级的日益拉大；种族平视和种族隔离现象依然如故，毫无改善的迹象；无节制的城市化趋势不仅带来了迅速蔓延的与其民区相伴而生的肮脏、疾病、骚乱、犯罪、恶习等社会问题，也给市政当局提出了举办新型社会工程的严峻任务；处处受制于党魁的肮脏政治使恣肆猖獗的腐败堕落充斥于各级政府，致使全国市、县级和州级行政、立法机关成为无能者的天堂和特权阶层惬意的争逐场所，而过时、老化的行政管理体制仍被用于应付政府所遇到的种种新问题；工业化时代日趋紧密的社会相互依存性织就了一张硕大无朋而又疏而不漏的实业竞争体制网络，而这个经营体制网络并未发育出它自有的一套社会道德准则，相形之下，从前农业社会里的道德准则已显得单纯幼稚和苍白无力了。

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A·罗斯认为，这些对社会犯下种种新罪行的人深陷在一种经营体制的网络里，他们大都是为人正派且高尚体面的绅士，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制造罪恶，这种情形加上司法机制的迟钝，导致一种实际责任无法确认和定位的“社会罪恶”。譬如制造和销售不洁的食品、有害的药物、染菌的牛奶和贻祸儿童的玩具，可能会造成疾病或死亡，而那些参与制造和销售过程的人——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广告人、公司董事——却没有哪一位意识到自己是在谋财害命。又譬如对防火、安全规定不加遵守，工厂、铁路和矿井没有安全设施，对不适于运营的工具未能查处，都可能使许多人丧生，但那些当事者决不会认为自己命案累累。还有如

对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监察不当，公司说明书弄虚作假，对股票、黄金或农产品进行投机，可能会给成千上万人带来贫困和苦难，但有关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犯了侵占财产罪。此外，收买选票，买通选举官员，贿赂议员，进行院外活动以求制定特别法案，或者公然违法行事或执法犯法，都有可能危及民主制度的根基，但有关人员几乎无人认识到，他们的行为等于是对代议制政府的损害和背叛。

面对积恶深重的社会罪恶，肇始于1890年前后，旨在改革现状的"进步运动"兴起了。随着"伟大的平民"威廉·J·布莱恩以其感人至深的"金十字架"演说崛起于美国政治舞台，这场运动迅速地在美国政治界、思想文化界和新闻界展开。

这场运动波及面广，内容庞杂，但其大致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它要求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集中掌握权力，对工业、金融、货币、运输、农业、劳工，以及社会道德标准实行有效的调控和引导。它的精神还体现在对社会中下阶层、妇女儿童、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外来移民等有了新的关切。它呼吁在政治中和商业中树立各种新的顺应时代要求的准则，主张设计出足以保证民主制度实效而洁净地运行的新政治方法和行政机构。它为争取就托拉斯、劳工、工厂、洁净食品、住房等问题立法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场"进步运动"蕴育着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哲学，或者是一种笼统的进步思潮。这种哲学或思潮包含了对传统自由放任主义的扬弃，倾向于论证应由公众依据自由民主制原则——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各种体制结构加以调控。这一明显带有道德进化意味的思潮显示了其深深植根于美国经验的持久生命力——布莱恩、拉福莱特、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等都是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服膺于它的社会试验家、政治改革家或斗士，而无论他们是民主党人或是共和党人。后来的学者们发现，即令从最间接最微弱的意义上看，也难以否认，"进步运动"为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提供或奠定了部分哲学基础和某些立法基础。

少年时代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多次聆听堂兄西奥多那富于激情的政治改革演说，那时他只能产生一种笼统的好感和肤浅的认同。后来这些改革的呼声透过大学的围墙隐约地传入富兰克林的耳鼓，他才逐渐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了堂兄西奥多等人刻意营造的改革气氛。他从哈佛大学毕业时，正值"耙粪者"们淋漓尽致地揭露美国社会形形色色的"黑幕"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日。这些新闻记者和作家们将他们的火力集中对准城市政治腐败、大公司与政客沆瀣一气等现象并猛烈打击。在林肯·斯蒂芬斯的经典性著作《城市的耻辱》中，就收录有题为《费城：贪污腐化的和心满意足的》、《匹兹堡：一座感到羞耻的城市》、《圣路易斯的无耻》等名片，而当时罗斯福置身其中的纽约更是等而下之。它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蔽：这座近40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1/3的人挤住在3万多处条件极其恶劣的经济公寓里，那里大多是"极不像样的老旧楼房、后院、黑暗潮湿的地下室、漏雨的阁楼、店铺披间以及拴牲口都几乎不适合、却改为住人的厨房"。这些平民窟成为疾病和罪恶的孳生地。欧·亨利发表于1906年的小说集《四百万》逼真地反映了纽约市的贫富悬殊程度——400万人竟然与400人所拥有的财富相等。坦慕尼协会及其头子墨菲几乎控制了这座城市的政治，损公肥私、

#### 第四部：蛰伏中的苦斗

## 竞选与道义

1920年全国面临着战后第一次大选，民主党则处境维艰。这种颓势实际上从1918年的国会选举中就出现了。战后民主党遇到了许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争本身所造成的困难。人民对于威尔逊执政期间的种种紧张、紊乱和不和——“战争、征兵、没肉吃的日子和实行战时节约的斯巴达式生活、国际联盟之争、‘赤色恐慌’，等等”——早已感到厌倦，共和党人便充分利用了战后人们通常发生的政治感情逆转或觉醒的心情。民主党人曾因操持战时经济历经种种困难而受到了损害，致使他们的联合体分离为许多互相争斗的利益集团；他们对于从战时过渡到平时也同样处理得不好，结果造成了经济失调；失业、饥荒和种族骚动；劳工们对埃斯——卡明斯法案、战后收入锐减和罢工遭到强制性约束感到忿恨，总检察长米切尔·帕尔默滥捕工人不仅毁坏了威尔逊政府一度作为工人的进步朋友的形象，而且还被自由派谴责为“政府保守倾向在日益增强”；农场主针对农产评价价格下降了13而B农业用评价价格维持不变的现象，向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西部小麦带农民早就对1917年的利弗法案表示了不满；中产阶级被战后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所累及。此外，由于威尔逊坚持以战争赔款来惩罚德国和把战争罪条款列入《凡尔赛和约》，从而疏远了自由派，而他不带任何一个共和党人去参加巴黎和会并且在那里一再妥协，也招来了人们的指责。重病缠身的威尔逊作为民主党的领袖和象征，其影响力正在日益消退和减弱。一位威尔逊政府内阁的成员说：“威尔逊现在之不得人心就像他一度深得人心一样。”但是他已经把民主党同他的国际联盟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威尔逊及其追随者们强烈要求在民主党竞选政纲中提出国际联盟问题，以借此实现威尔逊的宏愿，从而使这次大选成为一次“伟大而庄严的公民复决”。

面对这些现实，罗斯福同许多民主党人一样忧心忡忡，他担心他的党难以取胜，但也没有完全失去信心。1920年6月底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破例在旧金山举行。一开始似乎是威尔逊的女婿、罗斯福的好友、前任财政部长威廉·G·麦卡杜有望被提名的局面，但因分歧严重而形成僵局。大会直到在芝加哥的第44轮投其中才选定了以报纸出版商七家、两度担任俄亥俄州州长的詹姆斯·M·考克斯为总统候选人。考克斯在随后考虑副总统候选人属谁时选择了他并不认识的纽约州代表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名之前，特意征求了墨菲的意见。墨菲清楚地意识到民主党人此次得胜的可能性不大，并且罗斯福这几年间已没有像从前那样刻意同自己过不去，于是对考克斯的代理人说：“我不喜欢罗斯福，他在全国并不出名。不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破天荒地第一次对我这样尊重，所以，只要考克斯愿意，我准备连魔鬼都支持。请告诉考克斯，我们将集合起来，在第一轮投票时就提名罗斯福。”

考克斯作为一个妥协性的候选人，在州长任内致力于长期性的改革且政绩尚可，他同威尔逊长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考克斯之所以选择罗斯福作为竞选搭档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罗斯福以其在海军部卓著的政绩正成为一颗上升的政治明星，而他的籍贯、派性和政治倾向都恰好可以在竞选过程中发挥一种平衡效果，他同举足轻重的坦慕尼协会的关系已有所改善，这

将可能使民主党在纽约这个全国人口最多的州的严峻竞选局势有所改善。此外，罗斯福的姓氏可能会从共和党那边争取过来一些进步分子，因为西奥多去世的时间还不算久。

罗斯福本人在被提名之前并没有进行过什么活动，他只是对代表大会前夕流传的有关自己可能会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谣言"表示了赞赏而已。

考克斯和罗斯福专程拜会了威尔逊总统，中风后的总统神色憔悴，言语不便，内心的理想之火却仍在燃烧。也许是出于一种伟大的忠义之情，这对搭档不顾支持者的劝阻，毅然决定把国际联盟作为他们竞选争论的主要问题，但这个过于侧重于对外政策的竞选纲领显然不会为民主党带来好的效应。他们的竞选活动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将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结局，因为考克斯——罗斯福的"前途被威尔逊长长的身影遮挡着"。实际上，考克斯在竞选期间所作的许多冗长而措辞模糊的声明，已经表明他的政纲对国联问题作出了某些修改甚至重大保留。但为时已晚，人心的向背已成定势。

而他们的共和党对手、俄亥俄州马里恩县的"活动木偶"、国会参议员沃伦·G·哈定则几乎完全迎合了1920年选民的心意。他举止潇洒、相貌堂堂、嗓音浑厚深沉、和蔼可亲、极富心机。他以貌似超越对手的高姿态表明自己讨厌唇枪舌剑的辩论，并且常常无关痛痒而又无关大局地指出考克斯——罗斯福这对搭档的一些长处，而同时，又瞅准那种可以在民众中间产生最佳心理效果的时机，对竞选对手犯下的哪怕是极轻微的疏忽或错误也要惊叫一声，故作大惑不解、大惊小怪乃至小题大作。尔后再郑重地对其归谬、指正。此举竟然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在整个竞选期间，同考克斯马不停蹄地跑了22000英里、作了400次演说相映成趣的是，哈定几乎足不出户，只在马里恩老家的前廊发表过一些文告和演说。哈定的绝妙本领就是能将争端问题搅得模棱两可、不明不白，他在参议院本来是坚定地反对国际联盟的，但他的竞选文告和演说竟能使拥护和反对国联的双方都认为哈定站在自己一边。正如后来他的传记作者安德鲁·辛克莱所说："哈定一生都在尽力争取别人对他的赞许。他最讨厌被迫作出招人怨恨的决定。在他事业中的每一特定时刻，总愿意借风使舵，博取欢心。"他反复强调美国必须"恢复正常"，他宣称美国极须恢复的"不是英雄主义，而是调养创伤，不是各种济世妙策，而是正常状态……不是进行实验，而是保持平衡，不是沉湎于国际理想，而是维持优胜的国家地位。"他还预言，美国若参加国际联盟则无异于从此承担了处理永远不会完结的战争的义务，他大声反对美利坚居然还有17%的文盲，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还居然存在着贫穷。1962年美国历史学家投票排列历任总统的名次，哈定在31位总统中名列最后，是最失败的两个总统之一。

一般而言，副总统的竞选通常是稍逊一筹的。它作为一种陪衬，一种重外在形式而轻内容的例行公事，很少搞得场面壮观或轰轰烈烈。几乎历来的当事人都明白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尾随着总统候选人四处走上一遭而已。但是罗斯福打破了这一传统。

自1914年竞选联邦参议员受挫，罗斯福踏踏实实地干了6年，方熬到今天的出头之日，所以他分外珍视这次被提名的机会，并且本能地将其同自己的政治夙愿联系起来。尽管他已经大体上预见到它的结局，但性格既然，他决不能在众目睽睽下偃旗息鼓或顺其自然。

很多似乎无望的事情正是经过苦斗反而出现了转机。况且，那条竭力向前延伸并将贯穿着他的事业的平行线依旧横卧在他的意识深处——向特德叔叔看齐——特德叔叔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时是42岁，而他现在才38岁。

罗斯福迅速交代了海军部的事务，随即便与同事们挥手道别。海军部的工作人员献给退役的罗斯福一只银杯作为留念。罗斯福在临行前对丹尼尔斯表达了动情的感谢，他尤其感激这7年多来丹尼尔斯对他的体谅和容忍，以及丹尼尔斯“在他竭力要飞上天去的时候，巧妙地教会了他在地上走的本领”。

8月9日，竞选运动的帷幕正式在海德公园村拉开。在此后的80多天里，他绝大多数晚上在竞选专车上度过。他毫不停歇地在全国各州旅行，每天通常是发表7次有时甚至是13次演说，总计演说次数近千次。这次远征的阵容中有埃莉诺、宣传人员斯蒂芬·厄尔利、总管马文·麦金太尔、专职采访记者斯坦利·普伦诺西等。路易斯·豪后来也从华盛顿赶来助阵，他把罗斯福结识的上千个新朋友记了下来，尽力通过这次竞选让全国都熟悉罗斯福，他的眼光早已越过当下而投向了未来。

罗斯福在演说中不知疲倦地为国际联盟问题吁请公众支持。在反复阐明这个主题时，他说：“对于我们面临的世界性问题，我们要么闭起双眼，像东方人那样梦想着过去，过着与世隔绝的国家生活；要么睁开双眼，认识到当代文明世界已经变得如此错综复杂，而各个国家的人民生活也日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建立种种体面而亲密的外交关系日益变得不可避免，但是这种势在必然的正常关系竟然被魔鬼令人心惊地诬称为‘国际的纠纷’。”他进一步地宣称，国际联盟“是一个对现实形势的一种现实解决的方法。它虽不如我们最初提出的宪章那么完善，但它不反对国家而反对战争。通过它，我们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式加入这个组织的政府在和平的局面下互相贡献我们的精力和潜在力量。而把这一目标同美国政策对立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在国内事务方面，他主张要组织进步的和有效率的政府，不断地研究美国的工业、财政税率和社会问题，不断地采取行动以改善公民生活状况。合理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实行较高的劳工标准，而不要“堕入某一个集团的心血来潮或机会主义之中”。

这些主张无一不预示、暗含或标明了罗斯福的那些正处于反复探索和变动之中的政治哲学和治国方略的特征与结构。人们只是在过了整整10年之后才在无助的绝望中蓦然发现它们的意义。11月初，罗斯福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的结束性演说中表达了自己的信念：“正是我心中的信念使我确信，美国将选择进步的大道，把绝望的论调、卑怯的嗫嚅、倒退的小路统统抛到一边！”

罗斯福全身心地投入这次竞选，其积极进取的主动姿态格外引人注目，但并没有因过分“突出自己而使主角考克斯州长黯然失色”。在11月6日的大选中，像这样的错误并没有对结局产生多大影响。共和党人哈定——柯立芝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他们的多数党地位也得以恢复，并将此局面保持了10年之久。

罗斯福以达观的态度对待这一切，他在一封信中说：“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位前副总统，已被解除职务了。”他并非一无所获，他获得全国性的

知名度，结交了许多重要人物、了解了民众的情绪和要求、尤其是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教训——政治是实现可能实现的事物之艺术。而任何试图绕开或抵制政治现实的努力都是难以奏效的。——所有这些都对伺机东山再起大有裨益。

## 在野的商人政客

38岁的罗斯福10年来第一次成了普通公民。在与日渐长大的儿女们和老朋友们度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休整期后，他要开始工作了。整个柯立芝年代被实业家们称为“新时期”，电力的普遍使用和F·W·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推广，促进了全国工业的惊人增长，经济一派繁荣，商业投机、金融业活动既有利可图，又充满着风险。

波士顿富豪范·L·布莱克是罗斯福在游艇俱乐部的伙伴，他经营的实力雄厚的马里兰信托储蓄公司正好要在纽约开设一个分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证券发行的担保和海外投资等业务。罗斯福便担任了这家座落在百老汇120号的分公司经理，年薪丰厚，是他当助理海军部长收入的5倍。同时，他又重操律师旧业，在华尔街52号开设了埃米特——马文——罗斯福法律事务所。他给朋友写信说：“这两项工作显然可以很好地相辅相成。”

在此后的8年中，他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商业冒险活动，但绝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许多年后，他的政敌仍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谈到2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的罗斯福在商务活动方面的失败。他参与其中的各类公司都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在1929年到来的大萧条中，除一家之外全倒闭了。

罗斯福并未因接二连三的失败而遭到巨大损失，因为他很少在一笔买卖上大量投资。对此詹姆斯·M·伯恩斯认为它反映了罗斯福作为一位不肯对一次选举进行孤注一掷的政治家的谨慎作风和保守性的一面。似乎只有一次投机给他带来了收益：他帮助一家加拿大公司买进贬值的德国马克，用于购买各种德国公司的股票，尔后在出手股平时赚了一笔。罗斯福还加入过一些金融联合公司——“康普·邦德公司、联合银行公司”等，他大胆的闯入姿态引起了金融界的某些不安。1923年夏，罗斯福与一家行为可疑的企业发生联系时，金融情报协会秘书长F·安德烈写信给他说：“我非常痛心地发现，有人正在利用您的名字发售新股票，这尽管是出于良好动机，但从商业观点来看，终究是非常冒险的……十分令人惋惜的是，您的光荣而令人尊敬的名字正在被此类商业交易所利用。”罗斯福答复说：“您应当了解，对于一个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来说，避免让他的名字在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为各种企业所利用，有多么困难，不过我一定尽量设法注意这些问题。”罗斯福总是热衷于不停顿地提出新计划并参与试验，他喜欢新鲜事物。

1922年，罗斯福担任了美国建筑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作为建筑工业的一个行业组织，是按照商务部长胡佛的企业自动调节理论建立起来的。胡佛亲自主持了挑选罗斯福出任主席的会议。该委员会下辖全国250个建筑行业组织，成员有建筑商、建筑师、工程师和建筑行业工人。当时的建筑业因到处充斥着牟取暴利、工程舞弊、质量低劣、价格昂贵而招致公众的指责，新闻界和各种论坛纷纷要求对其内幕进行调查。罗斯福认为这是一种很好且健康的做法，但他反对由政府对工商业进行干预。他在该委员会的发言表明了这一点：“政府干预不是可行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是笨拙的，而且需要很多资金。这意味着要雇用一些人来从事这一工作，这意味着要增

加税收。公众不需要这种做法，工业界也不需要。"有一种习惯于历史地看待问题的观点认为，罗斯福在任总统之前的很多年里就已经基本形成了"新政"的关于政府调控私营经济的思想。其实这是没有依据的臆断。作为一个曾长期是威尔逊主义的温和派代表，他只是反对政府对于工商业的绝对放任自由政策。甚至到了1929年7月4日，州长罗斯福在坦慕尼厅的演说中，仍坚持重复着上述观点。罗斯福在担任美国建筑委员会主席期间，成功地依据反垄断法对一些建筑行业协会进行了起诉。他还帮助收集资料作出长远规划，以消除建筑行业中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他提倡在建筑业中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主张提高建筑工人的社会地位，恢复行会精神。

## 第五部：蜚声纽约州

### 轮椅州长

1929年元旦，46岁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入主设在奥尔巴尼的纽约州州长官邸。那个刚刚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竞选工作班子也随即取代了史密斯特意留下来的人：弗林出任州政府秘书，法利接管了州的党务工作，罗森曼为州长秘书，豪则负责经管罗斯福在纽约市的利益，这是一个对罗斯福忠诚负责而又精明强干的核心小组。罗斯福也显得健康乐观，他的左腿在不久前开始长出新肉。帝国州长的担子并非想象的那样沉重，一年之中他仍有不少假期和闲暇在温泉、海德公园、纽约的居所和外地旅游区等地度过。安娜已经结婚并给他生了个可爱的外孙。埃莉诺从事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福利工作也进展顺利，并且似乎劲头越来越大。

罗斯福并不甘于在前任州长的荫庇下坐享其成，因为史密斯留下了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行政体制。他还要给它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成为一个旨在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并具有明确目标的专家型政府。他让州长秘书罗森曼担任司法改革顾问，他以前曾在立法法案委员会供职3年。小亨利·摩根索担任农业咨询委员会主席，他对纽约州的农业问题素有研究并进行过成功的实践。苗条秀丽的弗朗西丝·帕金斯出任工业局长，因为她曾先后10年担任过州工业委员会委员和主席。研究公用事业管理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利兰·奥尔兹、哈佛大学的法学专家菲力克斯·弗兰克福特等都成了他在水电和公用事业方面的顾问。后来，莫利教授从他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中遴选出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加入了这个圈子，雷克斯福特·G·特格韦尔是农业问题的权威，林赛·罗杰斯在关税方面很有造诣，小阿道夫·A·伯利在信贷和公司领域的见解有独到之处。来自衣阿华州、长期在纽约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哈里·霍普金斯也在大危机年代逐步地走进了罗斯福的视野，弗兰克·沃尔克、威廉·H·伍丁、老亨利·摩根索等也成了他的财政问题顾问。这些有识之士从各自擅长的领域献计献策，后来构成了罗斯福竞选连任州长、入主白宫、推行新政时的智囊团的主体。

罗斯福竭力想为他任内的州政府树立一个不再被党派斗争的裹挟并直接面对人民的公正形象，他尤岂不愿意看到那些一味贪婪地从事"私人政治"



的坦慕尼协会成员将污泥秽水溅到自己身上，而自己又不能与之公开斗争的尴尬局面，因为这将导致民主派的更加分裂。为此，他在上任伊始就尝试了俨然超党派的行动准则和将重大争端性议题直接诉诸于人民的努力。他在"行政预算案"修正问题上同议会中占多数的共和党人展开了首轮交锋，最后靠诉诸纽约最高法院上诉法庭而取得了胜利。在围绕圣劳伦斯河动力开发和经营方式问题上，双方经过了旷日持久的争吵后陷入僵局，罗斯福便扬言将马上就此问题向全州人民发表广播讲话，从而迫使共和党对手基本接受了自己的提案。他还在农业政策、劳工立法、公用事业、监狱体系的改组、自然资源保护等方面提出了议案，他发现对付那些固执保守且故意从中作梗的州议员的最有效压力方式，就是通过无线电广播同全州人民进行一系列不拘形式的谈话（民主党已向全州所有电台都购买了每月1个小时的广播时间）。从1929年4月3日起，罗斯福常对着麦克风发表语调直率而亲切的谈话，他老练地声称谈话内容都是超党派的。而每次谈话的实际效果则是，那些反对派议员要么被迫举手通过，要么被公众谴责为出于自私的目的有意从中阻挠。这一斗争武器成为后来白宫岁月里"炉边谈话"的预演和前奏。

尽管罗斯福追求进步改革的效果并没有预其中的那般理想，因为几乎他提出的一切重大计划都因涉及面太广而在软弱的抵制中被打折了折扣，但罗斯福以平坦诚、直率而新颖的姿态和广泛的舆论影响打动了广大选民的心，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在他和小亨利·摩根索的建议下，民主党组织出资于1929年初在奥尔巴尼设立了一个新闻处，向北部地区和共和党控制的农村报纸无偿提供带有民主党倾向的材料以及州长工作要览，他还卓有成效地绕过亲史密斯的州委员会来加强民主党在州北部地区的基层组织，他更加广泛地在州内巡回视察，发表政见——所有这些努力都为竞选连任州长打下了基础。

共和党对手面对着声名日隆的罗斯福，决定狠狠打击他的最薄弱环节——他与坦慕尼协会的关系。共和党揭发了一篇与罗斯福有涉的州司法机关的肮脏交易——罗斯福按例行手续任命了一个坦慕尼分子担任普通法院法官，而这位法官在此前花了3万美元从坦慕尼协会买到了这个职位。他们声称罗斯福是坦慕尼协会种种龌龊勾当的同情者和纵容者。对此，罗斯福只得依靠妥协的策略摆脱困境，他认为"不能在对手安排的阵地上投入战斗"，而要迂回到另一些问题上去争取主动。一方面，他以超越党派利害关系的姿态，不动声色地将此案移交给州检察长（共和党人），并指定一名共和党最高法官召集特别大陪审团进行审理，他甚至还要求最高法院上诉法庭对地方法庭进行一次普遍的调查。另一方面，他以耐心的解释让坦慕尼协会认识到，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情势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在对待劣迹斑斑的民主党人、纽约市长吉米·沃克的贪污案时，他采取了类似的策略。1930年的选举在即，罗斯福离不开坦慕尼协会的支持。与此同时，罗斯福还采用了当时先进的有声电影和无线电广播来宣传自己的业绩。1930年夏，一部名为《罗斯福在干什么》的有声影片上映。多家保险公司的代表在医生们检查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时到场，检查表明48岁的罗斯福就像30多岁的人一样健康，保险公司对他投保56万美元，而通常一个人的健康保险最多不超过50万美元。共和党为了击垮罗斯福，特意从首都请来了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助理财政部长奥格顿·L·米尔斯，陆军部长帕特里克·J·赫利尔等纽约州人回来助拳，他们异口同声地谴责罗斯福实际上纵容了坦慕尼协会

的贪污舞弊。但一切终究无济于事，罗斯福以超出对手 72.5 万票的绝对优势再次当选纽约州州长。

## 脱颖于大萧条年代

罗斯福州长是在国内太平无事、欣欣向荣的背景下走马上任的。柯立芝曾说美国是一个搞实业的国家，所以需要为一个为实业界服务的政府。他的名言是：“建一座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在工厂干活就是在那里做礼拜。”满怀信心的胡佛则以“更大的繁荣”为口号取得了白宫入场券，他在竞选时宣称：“我将继续推行过去 8 年来的各种政策，那么，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将目睹贫困被放逐于这个国家之外的那一天。”其深合民意的“每家锅里一只鸡，车库里有两辆车”的诺言在全国不胫而走。他在就职演说中又说：“我们的成就结出的果实牢牢可靠，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超过。”各大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行情以胡佛上任为信号掀起了历史上截至当时为止的第二个最高潮，在他就任总统的前半年内，普通股票平均价由年前的 117 猛涨到 225，各大财团控制的巨型企业的股票更是上扬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地步，证券经纪人在红利的鼓舞下纷纷增加其银行借贷，美国公众也显得确实能够无限制地大量吸收各种股票证券，股票证券的制作与分配成为当时重要的热门行业。工厂就业率、建筑合同数、银行贷款额、货车载运量等几乎一切企业指数都在持续高涨之中，商业及其准则主宰了一切，举国上下的各个阶层和各类机构几乎都淹没在如罗斯福所言的“虚假繁荣”的巨大泡沫中。在一本被人们争相翻阅的畅销书中出现了这样的妙语：如果耶稣在世，他也会到广告公司当会计。因此，罗斯福在任内初岂不可能搞大刀阔斧的改革，史密斯的卓著政绩也给他留下了一个一时难以超越的高起点。他大抵上只能提出一些进步的改革议案，但起大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他倒是在同州议会中居于多数党地位的共和党人的斗争中，充分显示出了过人的才智和老练的手腕。总之，这种状况大约在一年后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改观——突如其来的局势为它提供了全部契机、可能性和一切场所。

1929年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纽约证券市场在经历了几次小小的预震后出现了坍塌，几十种主要股评价格垂直狂跌，绝望的人们疯狂地抛售，当天就有1289万股易手。崩溃的高潮终于在10月29日来到了：大批的股票涌到市场上来，不计价格地抛售……这一天疯狂交易以1641万股的最高纪录而收盘。……根据《纽约时报》的统计，50种主要股票的平均价格几乎下跌了40%。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市场——外国股票交易所、美国较小交易所、谷物市场，价格惨跌也接近恐慌程度。到11月中旬，股评价格又一次惨跌，“柯立芝——胡佛繁荣……处于垂死状态。在这种惊慌的冲击下，许多一向不受人注意或被证券市场乐观情绪掩盖的病害，开始围攻整个经济躯体，好像当某一关键性器官不再起正常作用时，病毒细菌渗入整个人体一样。”

事实确实如此，这次暴跌只不过是经济全面而持续衰退的一个开端。在此后3年多的时间里，金融业、商业、工业的指数依次成比例地剧烈下降，作为20年代经济繁荣支柱的钢铁、汽车、建筑等行业的衰退情况更是惊人，许多知名企业在逐渐消失。农民的总收入下降了57%，对外贸易总额下降70%，失业人数最多时高达1500万人。所有这些逐步构成了一次标志着美国经济生活分水岭的大萧条。

关于这次严重而持久的经济大萧条的基本原因，就连许多美国著名大学指定的标准经济史教材也承认，它是资本主义世界间歇性地或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其理论上的说法是：“在总的经济活动中，扩展与收缩循环交替，每一方向的替换运动都是自动加强，而且实际上渗透到经济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不断变化的因素表明美国经济生活缺乏稳定性。整个20年代的美国“工商业处于一种社会方面良好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环境之中，正是工商业制度本身造就了后来的萧条，而不是敌对的和外部的社会力量。”20年代的“新时期繁荣”没有确实的基础，正如威廉·Z·福斯特所说，它是“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废墟上的用旧纸牌搭起的房子”。具体而言，“新时期繁荣”中隐含着许多足以危害经济结构的因素：整个国民收入中成为利润即潜在资本的部分日益增多，而作为工资与薪水的那一部分消费支出在相应的减少，实际工资赶不上国民生产的大幅度增长，结果出现一种偏离劳动收入而偏向财产收入的现象，财富用于进一步扩充工业单元和疯狂购买股票市场利润，造成商平生产过剩，即使预支购买力的分期付款法也难以维持总消费量的增长，这样就出现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日益扩张的工业因内部比例失调出现了难以补偿的负担，钢铁、汽车、房地产等突飞猛进，而采矿、棉纺、造船、铁路运输及设备、制革等严重滞后；农业方面因战时过度扩张和欧洲市场骤减，更因美国饮食结构的改变、人口增长缓慢，以及海外竞争趋于激烈，导致美国农产评价价格和农业收入急剧下降；就业人口的上升几近停滞，还跟不上人口的自然增长，“技术性失业”呈上升趋势；因资本积累与资本集中速度过快，而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各国关税壁垒又引起投资出路狭窄，于是大量资本进入投机市场。工业、公用事业、铁路和银行都加紧印刷新的债券去适应日益膨胀的需求，成千上万的人们对自己的正当业务失去兴趣，转而集中精力去进行股票投机。整个信贷业务和投资交易充斥着公开的腐化与堕落；由于美国停止对外国贷款，国际汇兑中的美元贴水，贸易顺差使世界黄金日益流向美国，以及高关税政策招致他国的报复性对策等因素，导致欧洲的财政动荡和金本位制的难以复原，这不仅引发了现存国际汇兑与贸易制度的崩溃，也使欧洲长期无力从美国买进多于它们卖给美国的商品，结果便是美国向欧洲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同时锐减。从过程上看，证券市场崩溃引发了信用结构的破裂，社会分配体系随之解体，农产评价价格暴跌的同时，工业品却因垄断习俗和工资协议而稳如泰山，美国银行制度的弱点和欧洲金融恐慌更导致了复杂而持久的信贷危机，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宣告休克，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已不复存在。

严重的大萧条引起了美国人民广泛而深刻的消沉、不满、失望、怀疑和忿怒，这种情势加速了一个从来就不曾静止的社会的变化，而且促使人民去接受新的观点和平盼已久的变革。1930年的国会选举结果就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情势，民主党取代了众议院里的共和党多数，而且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席位减少到了最低限度。1928年南部和边境各州曾倒向胡佛的民主党人现在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原来对民主党有些怀疑的农场主现在因农产评价价格暴跌而接近破产，他们也不愿再投共和党的票。城市劳工接近民主党的趋势也明显增强。原来暮气沉沉、支离破碎的民主党组织也开始重新活跃起来，这些变化无疑对任何一个潜在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而言都是吉兆。民主党人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几乎整个20年代曾以繁荣和更大

的繁荣为理由在人民面前邀功的共和党，原来并不能垄断繁荣。罗斯福敏锐地认识到，目前正是自己有所作为并一展抱负的绝佳时机。其实，1930年罗斯福竞选连任州长的获胜本身就是他有效地利用这种形势的结果。

胡佛总统及其内阁成员经常单独地或集体地发表乐观自信的安抚民心的声明。与此同时，一个强烈而鲜明对照的便是罗斯福州长已经开始在帝国州这个重灾区采取了越来越激烈的全国为之瞩目的举措：他较早地改变了自己1929年冬的看法，他承认“局势严重，需要我们冷静而认真地对待这种局势，要像研究致命细菌的学者那样，首先弄清它们的性质、因果关系，最后找出战胜它们和防止它们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办法。”言出必行，1930年3月他提议建立了一个紧急救济失业委员会，其宗旨在于提出关于稳定失业情况的长期的可行性建议；他号召州政府要千方百计地帮助提高就业率，并提交州议会通过一项限制法院干预劳资冲突的法令，他还率先赞成把强制性失业保险作为一种实际上的救济方式；他切实地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及时有效地减轻了人民的疾苦并且扩大了公共事业（如大规模的造林计划）；1931年8月，他敦促州议会批准成立了临时紧急救济署（简称T·E·R·A），具有“洞察一切的判断力”的哈里·霍普金斯担任了该机构的主任，“该机构已经掌握着一笔大约3000万美元的经费，如果发行公债在选举日通过，它还可以拥有3000万美元。现在州里大约有100多万人的生活靠它照顾。”工作迅速、尽量不给罗斯福添加麻烦的霍普金斯所推行的失业救济计划规模之大，措施之激进，在美国各州中是空前的。尽管纽约州10%以上的居民平均每家每月仅可得到23美元救济款，可是这些钱已使他们得以免于饿死，而其他州每户每月只能从慈善机构领到几美元。这样按危机时期的标准看，纽约州的穷人在全国穷人中算是富户了。该机构的名称及其所作所为经常在全国主要报刊上出现，因而在美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倾斜。此外，该机构的创设，实际开创了一个后来罗斯福自己在“新政”时期，以及在为应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而组织举国力量时期所一再遵循的先例，即迅速成立一个新机构来应付和处理紧迫的问题。

尽管这些举措及其包含的见解与胡佛后期勉强推行的政府干预政策有类似之处，但一个是积极主动，一个是消极被动；一个是大张旗鼓地宣扬，一个是小心谨慎地辩解——结果他们两人在公众心目中造成了远比实际情况要夸张得多的不同形象。更重要的是，那些与罗斯福担任同等职务的其他州长们，要么一筹莫展、固步自封，要么走在了纽约州的后面。而同时令人惊异的是，曾经追求进步改革的史密斯、考克斯、戴维斯等重要民主党人（均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大萧条中都不同程度地向右转了，这样，一个具有灵活性、创造力和平力的罗斯福州长就在全国俨然显现为那种舍我其谁的领头羊风范，纽约州也一跃成为全美国有效对付大萧条的典范。换言之，在举国上下都被沮丧和绝望紧紧攫住并束手无策的时候，任何能够带来些微希望和亮点的尝试都会获得传播学意义上的聚焦、定格和自我放大机制。

## 应运而起

罗斯福州长对付大萧条的举措及其轰动效应无不表明，站在竞选1932年总统的起跑线上的罗斯福处于极其有利的一条跑道上，其成绩和声誉使得那些也想争当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人相形见绌。一开始，精明而老练的

罗斯福故意压低竞选总统的调门，以免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实力和有利地位而成为对手们的众矢之的。于是在他再度出任州长伊始，一个似乎是自发组织起来的要求他竞选总统的运动就在纽约州乃至全国兴起了，尽管其中有许多真诚地为美国命运仗义直言的罗斯福的崇拜者和敬慕者，但幕后操纵这场志愿竞选运动的关键人物乃是接受罗斯福授意的路易斯·豪、法利以及"纽扣俱乐部"的原班人马。"罗斯福之友"作为一个新的俱乐部组织在纽约市应运而生，并且很快在全国其他州发展到了50多个。1931年夏，法利精心地进行了一次横穿全国的旅行，以测试罗斯福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发现为达到这一目标尚需作些什么。法利考察的结果鼓舞了罗斯福，于是一切筹备活动紧锣密鼓地全面铺开，并且极具针对性。罗斯福这时也开始逐步走向前台，他频繁地招待来访的全国知名的政治家，不失时机地向全国宣传他对于大萧条的看法，及他的政治哲学和治国方略：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一个有组织的人类社会的合法代表，它是这些人为了互相保护和过上幸福生活而创建的。……我们的政府不是主人，而是人民的工具。国家对公民的责任就是仆人对主人应负的责任。……国家的责任之一，就是关怀那些陷入逆境以致不靠别人帮助就连起码的生存资料也无法获得的公民。”

1932年1月23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他已作了竞争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候选人。不久，就有起码6名其他候选人宣布加入这一角逐。首当其冲的便是业已同罗斯福分道扬镳的“快乐勇士”史密斯，其次是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新教徒、众议院议长约翰·N·加纳。相形之下，声誉鹊起的罗斯福州长经过一年巧妙的筹备，已然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但他的弱点也很明显，即其支持者成份过于复杂和分散，这将可能导致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难以形成一种凝聚力以及僵持局面下必不可少的耐力。并且，他的宿敌和竞争对手们立即开始针对他的一些薄弱环节展开了轮番进攻。

罗斯福的老对手、强有力的报界巨擘、孤立主义分子、民主党人威廉·R·赫斯特一马当先。他甚至在1931年底就开始对罗斯福实施了打击。他的报纸反复证明大萧条乃是美国的债务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协约国）没有能够偿还巨额债务所致，而罗斯福这样一位曾经力主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人显然不适于做总统候选人。他控制的报系拥有千百万美国读者，罗斯福若是对此置之不理或拖延行事，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在1932年1月底，罗斯福委托中间人暗中去说服赫斯特，岂料此举竟弄巧成拙，老辣的赫斯特不吃这一套，反而立即将罗斯福试图做的幕后交易公之于众：“假如罗斯福先生愿意声明他不是国际主义者，他应当把这一点公开告诉大家，而不是对我个人讲，……如果他担心对选举不利，当然也就没有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可同时又想私下做好人——对谁都是好人，更确切地说是对一些人是好人、而对另一些人是犹太的话——那么，当然，他既得不到公众的信任，也得不到个人的信任。”

私下妥协的努力受挫，路易斯·豪也承认这是致命的打击，必须尽快对公众有所交待。

经过一番准备，罗斯福于2月2日在纽约向"保护农业社"发表了答复赫斯特的演说，他首先全面地回顾了国际联盟的发展演变史，“今天的国际联盟已不是伍德罗·威尔逊所设想的国联了。这些年来，国联的主要作用已经不把世界和平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而只是一个讨论欧洲各国政治困难的会议场所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应参加这种讨论。这些年来，国际

联盟并没有沿着它的创始人所期待的途径向前发展，而且它的主要成员国也没有作出安排，把用于武装力量的巨额资金转向合法贸易、平衡预算和偿付债务方面。美国加入国际联盟并不能按照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去达到防止战争和解决国际困难的最高目的，因为这些事实，所以我不赞成美国参加。”同样地，他也改变了对战争借款问题的态度，他非但不提醒他的同胞关于美国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是怎样削弱了欧洲的偿还能力的，相反，他抨击欧洲国家巨大的军费开支，并以此证明欧洲人欠美国的债务是有偿付能力的。他还抨击了1931年斯穆特——霍利的过高的关税对国际贸易及美国人民的害处，并主张美国不要强迫那些没有现金的国家支付现金，从而实现商品互惠贸易的顺利进行。他在演讲结束时宣称：“美国的崇高理想要求我们严格遵循华盛顿的原则，在国际舞台上保持我们的理由，同时愿意向贫困的人类提供指导。”

## 第六部：新政大夫

1932年7月2日，即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的翌日，著名漫画家罗林·柯尔比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幅漫画：一个疲惫的农民倚锄仰望天空掠过的一架机翼标有“新政”字样的罗斯福座机，那迷惘的表情中透着些许希望，自此，“新政”一词就作为罗斯福施政纲领的鲜明标志不胫而走。

罗斯福在1932年7月2日发表演说时，其关于“新政”的学理性概念以及明晰细致的蓝图并未形成，只是具备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和意向性的原则目标。罗斯福很善于感受公众的情绪，他后来的那些没有先例的大胆行动的表层之下往往闪烁着直觉的智慧火花。他看到美国人民在无助的困境中渴望试验，渴望试验只要能显示出运动或新颖事物的意思就行，渴望新的转机，只要不是照旧按部就班死气沉沉就行。他表示自己看到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面孔，“那是迷了路的孩子们常有的绝望表情。”因此，罗斯福能够对民众意愿、社会舆论加以引导和必要的推动，把群众的愿望转换成政策。他所接受的社会哲学、政治学理论和经济学知识的教育与胡佛大致相似，胡佛固守自己的信念，往往是在经营管理人员的精细气氛中谨慎行事，未免匠器太重。罗斯福则关注结果而不是抽象原则，感情充沛而又从容自信。胡佛很少公开向人民表明他正试图做些什么，他甚至在公众场合尽量避免提到或使用“萧条”这个词，而罗斯福往往能够在一项政策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时候就清楚而有力地说明其指导方针。在罗斯福一步步地走进白宫的过程期间，美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局面，为人们普遍熟知和易于接受的传统理论已不能给他多少启迪和指引，这就势必出现一个摸索、在纷乱和挫折中寻求出路的阶段，而这时只有具备勇于试验的精神和不畏惧犯错误的胆略的领袖才能实行“新政”。罗斯福不拘泥于陋习陈规，乘飞机直抵芝加哥提名代表大会并破天荒地亲自发表演说——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种充满活力和独创精神的举动给人民以惊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认为，“新政”的核心，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哲学，还不如说是一种气质，一种植根于勇于在未知领域大胆行动而不惧铸成大错的信心的气质。罗斯福在当总统后

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把自己比作橄榄球场上的四分卫，四分卫知道下一次如何打，但超过这一点他就不能预测或硬性安排，因为“以后的打法将取决于下次取得的结果”。因此，不能一开始就把“新政”视为一种宏伟精致、面面俱到的且寓意深远的治国计划。在“新政”实施的6年多时间里，既有一系列临时紧急措施，更有不少深思熟虑的计划，也有作为迫于各方压力的折衷或妥协的结果，故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其中难免有互相牴牾和彼此消解之处，但是从政治策略方面考察，它们却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或内在联贯性。

确实不能简单地把“新政”等同于一系列权宜之计或急就章的大棋盘。有些观察家在审视他的各项措施的产生过程时，过分强调它们往往是极其随便或一时心血来潮的标新立异的产物，从而得出结论说，罗斯福取得的成就纯属偶然，就像随随便便地放上几枪也会有可能击中靶子一样。其实不然，“新政”有着极其深远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它与罗斯福的成长历程、所受教育、个性品格、政治信念、领导作风，以及进步运动、当时的舆论压力、西奥多和威尔逊的政治主张等等因素，都有着或隐或显、或疏或密的关联。它在罗斯福的纽约州长任内已显露端倪。自罗斯福宣布竞选总统提名之日期，他麾下的那个主要由专家教授组成的“智囊团”就开始为拟定“新政”政纲，“参考了上千种书籍，借鉴了大量以往政治经验。”这个人才济济、日益壮大的顾问队伍代表着各种政治观点和经济主张，罗斯福则是“万向节、配电盘、变压迫”。事实表明，正因为如此，当时两大党的头面人物中，唯有罗斯福能够拿出一份与经济大萧条作斗争的建设性的进步纲领。

## 新政的序幕

罗斯福的竞选总部设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331号一所不太引人注目的办公楼里，这个匆忙组建的机构有工作人员600多人。依照惯例，罗斯福任命法利取代拉斯科布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法利和莫利在工作上作了严格分工：法利负责在全国拉选票，他精通战略，熟悉细节，树立了现代总统竞选的模式；莫利负责率领“智囊团”为罗斯福气草演说稿和备忘录。“智囊团”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繁荣的基本前提是消费，因而要设法提高社会购买力。他们殚精竭虑、共同提炼出来的精华都汇聚在罗斯福的16票主要演说稿中。

部分地由于想要证明自己精力充沛，平息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各种非议，部分地由于要利用个人魅力作为资本，罗斯福选择了巡回旅行的“树桩演说”的竞选方法。1932年9月12日，由6节车厢组成的竞选专列从奥尔巴尼驶出，随行的有埃莉诺和儿子吉米、利汉德小姐、莫利、法利、沃尔什、参议员基·普特曼、记者、技术人员、保安人员以及“纽扣俱乐部”的成员马·文·麦金太尔等。罗斯福专列首先横穿北美大陆，抵达西海岸的旧金山，然后调头到洛杉矶、西雅图、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衣阿华、伊利诺斯、底特律。然后他又去了南部诸州，还有一次到了属于共和党势力范围的新英格兰。他总共发表了16次重要长篇演说和67次短篇演说。作为一名竞选老手，他依旧针对所在地的具体情况把每一篇演说内容限定于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样，他就等于费尽心力地谈到了各种不同主题：关税政策、农业计划、公用事业、财政公开、管制证券经营、消除贫困等。他在很多问题上并不单刀直入地明确表态，而是尽量多留些余地，以便使自己处于不易受攻击的稳固位置。但是，所有的演说都贯穿着这样一

根红线，即通过抨击胡佛政府来强调改变现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对胡佛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严厉批评：它通过其虚伪的经济政策鼓励了投机活动和生产过剩；它极力地低估大萧条的严重性；它错误地将经济崩溃的原因归罪于其他国家，它拒绝承认和纠正国内的弊端；它迟迟不发放赈济并且忘记了实行改革。

对此，胡佛展开了有力的反击。他发表了9次重要演说。他认为促成大萧条的是一些他不能控制的情况和事物——世界大战后遗症、经济的过度膨胀、投机行为、1931年欧洲经济的崩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金融的影响和消费的下降。他重申自己的基本信念：联邦政府职能不能扩大、有秩序的个人主义与机会均等。他集中火力抨击罗斯福政纲中他称之为“激进主义、集体主义和随意的试验”的那些部分，声称这些东西将导致灭绝自由、希望与机会的专制官僚主义统治下人的规范性。他镇静地劝告美国人民千万不要被政治蛊惑家的口号弄得惊慌失措或病急乱投医。他提醒同胞们注意：“今后我国100年往何处去，关键在于是恪守美国传统，还是乱搞什么新花样。”胡佛的内阁成员也来帮他掠阵，农业部长阿瑟·M·海德指责罗斯福是个“典型的骗子宣传家”，海军部长查尔斯·F·亚当斯预言如果罗斯福当选，将有1亿美国人的身家性命难保。胡佛还请出前任总统柯立芝发表演说，以壮自己的声威。但这一切努力均无助于挽回日益加剧的颓势。7月底胡佛粗暴地镇压索取退役金的失业退伍军人，成为大萧条及其对人民造成危害的一个可悲而发人深思的纪念。胡佛失当的举措遭到广泛的声讨，这也加深了人们对像他这样的不顾人民死活且冷酷无情的总统的印象。这位曾在10多年前成功地向欧洲1.5亿人口发放救济的救星，现在却振振有词地坚决反对任何直接的政府救助。在举国饥饿的阴晦日子里，他却让新闻记者拍下了他在白宫草坪上喂狗的照片。外出竞选的胡佛所到之处，人们报之以嘘声、怪叫、愠怒、木然的沉默、臭鸡蛋、西红柿，以及“绞死胡佛”、“打倒凶手”的口号和标语。他面对听众寥寥的场面显得局促不安，加之几年来在白宫被大萧条折磨得精疲力竭，明显地迅速苍老的他面色灰白，皱纹深陷，眼圈发黑，紧握讲稿的双手不时地颤抖，雕塑家格曾·博格勒姆说：“如果你放一朵玫瑰花在胡佛手里，它就会枯萎。”胡佛在最后一次演说中费力地舞动着手臂，警告选民们如果罗斯福当选，成百的都市、成千的城镇将长满青草，杂草还将蔓延到百万个农场的田野上。在此之前，《文摘》杂志的民意测验预言罗斯福将大胜，赌博公司赌胡佛会赢的赔率是1/7。

罗斯福在竞选期间的演说没有也不可能预告出“新政”的全部内容，只是他在9月23日旧金山联邦俱乐部的演说，却基本上大体阐明了“新政”所将遵循的新道路及其包含的政治哲学。首先，他表示这次演说主要是谈一谈普遍原则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并强调美国这个崭新而富于活力的国家正处在飞速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在唤起听众对美国民主发展史和政府对工业的巨大促进的愉快回忆之后，他话锋一转，指出美国在启发展过程中业已抵达一个新的分水岭：从前，由人民管理的政府和可供开发的广阔大陆为美国早启发展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随后的工业革命又为所有人带来了物质丰饶的希望。政府在那个人人机会均等的扩张时期采取了有促于工业发展的不干预政策，但美国的生产力和自然资源被一些残酷、贪婪的掠夺者所控制和浪费，于是转折在世纪交替之际发生了，最后的边疆消失了，工业组合已成为巨大的不受控制和不负责的国中之国。受到威胁的人民要求政府加强对经



济生活的明确控制，因而就产生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政治”和威尔逊的“新自由”政策，而目前1932年的美国已然面临着经济寡头制控制全国工业并统治经济生活的严峻现实——

“显然，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重新评价和核定原有的价值观念。一个要建设更多工厂的人，一个要修筑更多铁路的人，一个要组建更多公司的人，这样的人既可能有益于社会，但也同样可能是一种祸害。从前那些大投机商和金融寡头们只要开发或建设什么，我们就什么都可以给他们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探测或开发自然资源，或者去生产更多的商品，而是更冷静、更平稳地管理好已有的资源和工厂，为我们的剩余产品重新开辟国外市场，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按照消费状况调整生产，更公平地分配产品和财富，使现存的经济组织服务于人民。开明管理的政治时代已经到来。

“现在，在更严密的经济结构里，集中的、好大喜功的金融部门也已不再是众望所归的公平，而成为一种威胁。……今天，我们就要改造和重新掌握我们的经济部门。在我看来，政府在它与实业的关系方面的任务就是协助制订经济权利宣言，建立合乎宪法的经济秩序。……当前的情势表明，建立这样一种秩序不仅是政府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而且也是保证我们经济结构免遭风险的唯一路线。现在我们都已知道，如果不能实现均匀一致的普遍繁荣，也就是说，如果购买力在全国人民各个社会集团之间得不到很合理的分配，那么这些经济单位就不能存在。”

## 第七部：拒绝摆布

### 隐隐风雷动

由于大萧条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历史背景，由于第一次新政不可能在经济复兴方面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在1933年秋天，农产评价价格和工业生产再次回落。这种迹近于衰退的下降势头到了1934年春季才被克服。《纽约时报》每周工商业指数由1933年10月的72上升到1934年5月的86。尔后一直到1935年春季，全国经济停滞不前，月复一月，商业活动指示图表几乎原封不动，利润缩减现象继续存在。1934年的国民收入总额只是比1933年高出不到1/4，比1931年少100亿美元，稍多于1929年的1/2。秋天仍有1300万人失业。第一次新政没有也不能给全体美国人民带来好处，很多人甚至还没有受到罗斯福的关注——南方的佃农、老年人、雇工、失业的大学生、农业季节工人、1年只干3个月的钢铁工人、共约700万人的城市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信仰徒等。这些人急切地盼望美国能够出现一些能够引导他们脱离苦海的救世主。那些受惠于第一次新政的不同阶层的人们，其一度绝望的恐惧感业已随着境遇的初步好转而消退，生活质量的改善激活和触发了原已被冻结或麻痹的神经，他们不再祈求起码的温饱，他们的期望值开始升高，开始反过来对复兴的不稳定状态感到不满，对新政扶助工农的成绩有限不满。社会心态的这种变异在当时极其自然地发生、蔓延并流行起来。曾经是死水一潭，现在则是

激流澎湃。

首先是垄断资本家们。这些曾因自我毁灭式的疯狂投机和盲目竞争而陷于没顶之灾的私营业主，在被罗斯福政府救上岸后，开始挑剔并指责救他们的人没有捞其他他们的丝织礼帽，他们已不满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要求解脱束缚。他们对罗斯福曾寄予莫大希望的要求他们出于高尚精神而进行自我调节以及与政府合作的吁请，由不动声色而嗤之以鼻，继而鼓噪嘲弄，“在有钱人的会议室和城郊俱乐部里，总统的名字变得不堪入耳。不论是总统还是他的财政部长都不能在银行家、证券经济人和实业家集会上讲话，而同时却不用担心会招惹麻烦”。他们开始对新政府进行挑战。

几乎与此同时，两党保守派显露出了其一度收敛的敌意，对政府的表现与经济的停滞幸灾乐祸，并在媒介宣传中特别强调两者存在着必然联系。他们甚至对自己以前的行事感到后悔，他们不喜欢新政那样的愿意在预算方面出现比胡佛任内更高的赤字，不喜欢新政用美元搞通货膨胀来弥补赤字，不喜欢新政社会救济项目的规模和华盛顿在许多经济决定中表示的一致意见。对于罗斯福不知怎么从他们熟悉的政党和企业界之外发现并给带到华盛顿来的那些人，他们也深感不安：这些人包括像特格韦尔、莫利、伯利那样的学者，以及像霍普金斯、华莱士、珀金斯那样的社会活动家。一位年长的参议员声称这些人是一种新型人物，根本不能激仆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共和党保守派坚信现有工业和金融体系应不受阻碍地从事活动，它名义上的领袖是胡佛，胡佛批评政府的倾向已由于个人的痛苦遭遇而加强。有些民主党人对政府放弃健全财政这一悠久的党的原则感到不安，预算署署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在1934年8月因此而辞职。也正是在这个月里，一群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在全国委员会前任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1929年党的领导人艾尔·史密斯以及若干杜邦集团成员和其他人的领导下，组成了“美国自由联盟”来反对政府所作的社会实验，他们不怀好意地宣称，罗斯福总统对复兴经济的下一步作法至今尚无一个明确的计划，这是政府陷入困境并不攻自破的明证。激进派的报刊极力反对新政对资方的迁就和照顾，认为这种“经纪人国家”对大托拉斯打击不力，“记录表明，人们能够期望于新政的只有失败”。政治蛊惑家们则抓住这一时机大做文章。然而，生活于这种徘徊不前的经济境况中的人民群众感受最真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不断增长的不满和抗争。

值此多事之秋，全国又在30年代中期天灾连年。各大盆地的河流泛滥成灾，无以数计的街区和良田被冲毁。由于无节制的狂伐滥垦，许多地区的地表呈现荒芜性侵蚀，植被生态遭严重破坏，“黑色风暴”旋即肆虐中西部各州。这里经常有这样的壮观的景象：无涯际的高耸入云的尘幕遮天蔽日，并缓缓向东南方推进，道路、棚舍、厂房、机器、庄稼几乎瞬时被沙土淹没。1934年，全国资源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全国有3500万英亩可耕地完全被毁，12500万英亩土地失去了表层土壤，这势必造成了大平原区随时即发的饥荒。并且，1934—1935整整两年里，各地旱灾连绵不断，得克萨斯州的几个县沦为流动的沙漠，连俄克拉荷马市的食物都带有沙土味。远在东边的孟菲斯，行人用手帕盖着脸。7,000英尺厚的尘雾，使克利夫兰市一片昏暗。从内布拉斯加吹过来的黄沙，透过了白宫的门窗。西部平原的尘屑飘落在大西洋中300英里外大海的船上。这年冬天，新英格兰诸州还降了红雪。夏秋两季气温居高不下。天灾部分地有利于联邦政府实

现其减少产量以保证利润、提高购买力的农业调整计划，但对于千万个受害的家庭和个人而言，是一场不亚于大萧条的特大灾难。他们被迫从焦干的沙砾地故土上出走，四处流浪。俄克拉荷马州的逃荒灾民成了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人物原型。小阿瑟·M·施莱辛格说，这些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和铤而走险的穷光棍极有可能在某个杰出人物领导下，闹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或可怕的大动乱。

其实，激进而暴烈的行为已经在全国各地滋长并大有燎原之势。1934年4月，明尼阿波利斯的6,000“暴民”（以卡车司机为首的工人）向正在开市政会议的市政厅窗户里投掷棍棒、石头和煤块。入夏，冲突升级，武装警察开枪击倒工人67人；5月，南卡罗来纳的纺织工人组成飞行中队同警察激战；秋天，丹佛市1,000名靠救济为生的工人，因救济金削减而愤怒地要求撤换州行政官员，并同警察在街头对垒；密尔沃基的电车工人在社会党的组织下，攻击车库，迫使雇主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费城的出租汽车司机焚毁了100辆出租车；得梅因的电业工人举行同盟总罢工，全城在一漆黑暗中陷入混乱的瘫痪；共产党人领导了加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农业工人的罢工；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美国工人党鼓动罢工的电瓶汽车灯具厂的工人与警察和头戴钢盔的国民警卫队搏斗，他们面对刺刀、催泪瓦斯以至排枪扫射，都无所畏惧，最终争得了工会的大部分要求。在五一劳动节之后的几个月里，从东海岸的罗得岛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几乎每场罢工中都有工人流血，这一年全美发生罢工1856次，参加的工人约有150万。1935年，罢工浪潮仍在继续，共发生罢工2014次。左翼党派组织和劳联中的激进派为争取组建产业工会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并对罢工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全国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1款规定给予工人的那些权利唤醒和刺激了工会的组织活动，而广大工人在实践中发现，他们并不能完全依赖政府许可和法律条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有时罗斯福政府迫于强大公司的压力作出的有利于资方的决定更使工人坚定了这一信念，即为了很好地享用自己的权利，必须显示出自己强有力的独立力量。此外，自大萧条以来，他们郁积了太多的对资方的愤慨。

来自“左边的惊雷”仍隆隆作响，还不时掺和进来了一些不谐音。许多进步派和激进的自由主义分子开始怀疑罗斯福新政策的成功希望，他们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纲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激进派，愿意同自由主义者一道为他们的政纲而奋斗，“如果资本主义不能防止萧条卷土重来，我就希望现行体制干脆见鬼去。”“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合作共和国”。当年的黑幕揭发者以其《屠场》直接促成了肉类检查法获得通过的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提出了“终止加利福尼亚州贫困计划”，他提议向新政尚未着手解决的关键问题——富裕中的贫困直接进攻。他主张让加州的失业工人在国营工厂和国营农场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反对“为利润而生产”，主张“为使用而生产”。这位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家宣布竞选1934年11月的加州州长。并在8月28日的民主党初选中，得票遥遥领先，从而引起保守派的恐惧和群起而攻之。

在充满着骚动、焦灼、寻觅、失落的这些年份里，以形形色色的激进面目而出现的“政治蛊惑家”们向大众兜售着似乎是精心炮制的治世良药。他们利用了当时美国人民还不大明白的民族性格的某些方面：美国式的天真烂漫、全国普遍向往寻求简单明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爱参加团体组织的心理、

天生喜欢收集外表好看而其实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脾气等等，即卡尔·G·荣格称之为美国民族性格中幼稚的一面。

弗朗西斯·E·汤森医生，曾是加州长滩的一个公共卫生官员，在1933年他66岁失业时，几乎一贫如洗。在目睹了大批与自己境遇相似或更惨的老年人后，这位瘦弱的戴眼镜的老头子迅速成为一名业余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1934年1月，汤森成立了老年人周转养老金组织，其目的是要使年满60岁以上的老人（刑事惯犯除外）每月都能享用200美元，唯一的附加条件是必须在本月内花光于国内。这笔周转基金来源于由联邦政府征收的2%的营业税。汤森及其信从者声称，这基本上是一项旨在减少失业、刺激消费的经济复兴方案，而不是一项单纯的补助金计划。尽管批评者们指出汤森计划具有以假定为根据的虚妄性，因为它要将一年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以补偿仅占总人口的9%的老人。但汤森十字军运动仍然蔓延到了主要由农村新教传统培养起来的人们中间。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因为失业、贫困、疾病和孤独而陷入凄凉晚景的老人们，对这一令人振奋的号召抱有强烈的近乎宗教般的理解。他们跟着汤森异口同声地谴责罗斯福新政忽视了老年人，并成功地把支持该运动的人选进州议会和国会。到1934年底，汤森宣称有2500万美国人在他的请愿书上签名，他的批评者们也承认签名的人品码有1000万人，到1935年初，汤森俱乐部已达2000多个。"西海岸的政界人士如果不赞同这位医生的计划，就会被汤森的报复吓得发抖"，西部7个州的立法机构一度几乎受制于汤森运动。国会议员们明知其经济上的细节存在着明显错误，却迟迟不敢冒险就这一计划试行唱名表决，直到1939年6月。

20年代来自加拿大的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则显示了比汤森医生更大的能量。这位40出头的神父身材高大，修饰整洁，声音圆润优美，庄严感人，词藻华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和说服力。到1930年底，他已经成功地树起了一个广播网，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17个电台同时向全国广播他的节目，另外还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6时至7时的地方电台穿插一些广播。在有一次抨击胡佛总统的演说后，他收到120万封信。到1932年末，他每周拥有约近4000万听众。他在1934年收到的邮件，比全国任何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都多。每周听他布道的听众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而且稳定不变，每周信件8万封，多至100万封，很多都内附小额捐赠的美元。他有时要雇用150个办事员点钞叠钱。1934年纽约WDR广播电台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库林格神父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公民"。后来在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闹僵后，他干脆建起了自己的广播网，有60多个电台，还办有自己的企业。他支持罗斯福竞选总统，也曾一度热烈地赞扬"执行着基督政策的新政"。到1934年春，他还许诺"决不改变他认为新政就是基督之政的哲学"。他有时也破例地赏脸接见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瑟夫·P·肯尼迪（美国第35任总统的父亲），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也是个罗马天主教徒。

当罗斯福政府的新政举措（特别是货币政策）并未依照他的旨意进行时，库林格就在1934年下半年逐渐与新政决裂。他痛斥农业调整法是"异教之政"，咒骂罗斯福的顾问们是"窝囊团的谄媚之徒"，指责财政部为邪恶的国际银行家效劳。是年11月11日，他宣告成立争取社会正义全国同盟。他认为美国的两党制已经腐朽，资本主义已经完蛋，罗斯福代表了"邪

恶的资本家、犹太人、共产党人、国际银行家和财阀”，而只有自己的16条原则才能拯救人民。他号称拥有750万盟员。该同盟的狂热分子还组成了许多打手队，上街向犹太人寻衅。他还攻击美国劳联，主张政府在处理劳资冲突时应学习意大利。到1935年春，库林格神父越发倾向于宣扬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主张，倡议在美国建立一种类似于意大利社团主义的政治秩序。

但是，对罗斯福政府真正地构成威胁的却是地地道道的政客休伊·P·朗。朗在1928—1932年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32年进入参议院，他机智幽默、聪明绝顶，擅长发表令人荡气回肠的演说，只是“那矮胖的身材和花哨的穿戴掩盖了他这位外省政治家的才华和魅力”。他在州长任内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政策：打破大公司的垄断势力，取消人头税，免纳平民普通财产税，免费发教科书给学生，为成年人扫盲。在3年内，他为本州修筑了2,500英里柏油路，6,000英里碎石路，12座桥梁，他还是南方唯一的平等对待黑人的州长。他的口号是“人人是国王，但是没人戴王冠”。他身在华盛顿任参议员，却牢牢地遥控着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和州议会的一切决定权。他曾在1932年6月的芝加哥支持罗斯福成为总统候选人，但两人的合作在罗斯福就职1个月后就开始破裂，他瞧不起罗斯福和他那些城市里出身的受到良好教育的新政派人士，他也不喜欢“百日新政”期间的那些政策。他预备在1936年入主白宫，最迟1940年要进去。

“以前他发现，对付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主和石油公司，最容易的政治手法莫过于揭露他们对这个州赤裸裸的掠夺，而他对上层阶级政治领袖的嘲弄也确实吸引了许多乡村追随者。现在，他希望用同样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权力——即揭露罗斯福自称的新政改革派的合乎道义的领导，其实是庇护着垄断财富和独享文化教养机会的一个全国性的统治阶级。”他以特有的机智为自己打通闻名全国的道路，他写了一本《我在白宫的头几天》的书，书中说作为总统的他将让罗斯福当海军部长。他在参议院里霸气十足，公开嘲笑罗斯福和他的阁员。他直率地当面要求罗斯福总统给他以庇护和赞助，谈话时他也不脱下那只条纹水手草帽，只是在为讲清楚某一论点时，拿草帽轻扣总统的膝盖。他很快成为一个国际知名人物。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民意测验表明，朗若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将会夺去罗斯福400万张选票，并且他的实力还不限于南部。

## 第八部：风暴前的权宜

### 山雨欲来

1936年6月21日，采访过欧洲主要国家首脑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夫人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就罗斯福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治国者的外貌作了比较。她发现后者为执掌政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张和焦虑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艰难时世令他们面容憔悴，过早衰老；他们全

神贯注于自己造成的令其精疲力竭、焦头烂额的时局，他们在孑然独处时显得疲惫而困惑。而美国的罗斯福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形象：总统职务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之少令人惊异，他在愉快而自信的神情背后保持着一份超然的宁静和安详。“他体重略增，华发少许；几乎就同就职那天一样硬朗健康。他脸色晒得黝黑，眼睛碧蓝明亮；自上次竞选以来度过了极其折磨人的4年时光后，这双眼睛反而比过去更加敏锐、好奇、友好而深不可测了。”

出现如此鲜明的反差，当然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但其中应该有这样一点，即同为国家首脑，罗斯福的内心世界所观照的外在环境以及正从事的事业迥然有异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且在这方面甚至有着质的不同。

在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职的次日，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举行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几乎在同时，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即兵临长城脚下，开始攻打长城各要塞。罗斯福的就职演说中只有一小段是讲述对外政策的。当时深重而危急的国内问题迫使他不能，也不便多谈外交政策。睦邻政策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对国际关系问题的态度或期望，也基本上反映了罗斯福对美国在国际方面的希望。但是，希特勒控制下的德国，并没有坐等罗斯福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先去处理好国内问题。当罗斯福把美国青年编组成“造林大军”去中西部山坡植树造林时，希特勒把德国青年编组成“褐衫大军”、党卫队和“冲锋队”；正值“第一个百日”新政刚刚过去时，希特勒把全德国的经济纳入了他的“总体战争经济体制”。希特勒旨在将国内外所有的德意志人重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治欧洲和号令世界的“优等民族”。其手法不外两种：一是如洛克腾堡所言，“以一种魔鬼般的本领离间他的对手并利用他们的弱点和愚行来取利”；二是如丘吉尔所言，“从失败的深渊里召唤出了潜藏在那个欧洲人数最多、最有用、最残忍、最矛盾而又最招致不幸的种族身上的那些阴暗、野蛮的冤魂”。希特勒唯一能够容忍而且仅仅愿意容忍的是其他地区的同他目的相同的那些统治者。这包括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日本的东条英机等其他地区的小独裁者。拉美的一些独裁者和准独裁者们能量有限，但各自扶植了一支对美洲安全具有潜在危害的亲近纳粹的“第五纵队”，这对于罗斯福的睦邻政策而言，显然是不利的。

罗斯福的教养、政治理念、从政经验（尤其是一战中的经历）和禀性都决定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此外，他还具有这样一种情结，即长期萦怀于心而又挥之不去的威尔逊式的国际主义。他在1928年以后的4年里，一直设法避谈对外关系问题，主要是因为面对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为了着眼于1932年的大选，他必须要模糊自己的立场。1932年大选期间，穷追不舍的孤立主义分子赫斯特一度将罗斯福弄得窘迫不堪。当时罗斯福勉强应付过关，已使国际主义分子大为沮丧。亨利·普林格尔在《民族》杂志上写道：“罗斯福扯下了他过去高举的旗帜，但却没有树立新的旗帜。”对此，罗斯福有口难言。

最具权威的罗斯福传记作者弗兰克林·弗雷德尔以其多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关于罗斯福的外交思想，“从他任总统期间总是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来看，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从他相信美国的幸福有赖于其他各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保障来看，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事实上，在竞选运动胜利结束以后，罗斯福就立即抛离了他那发表于1932年2月2日、旨在回复赫斯特的演说中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他在对

外关系问题上的一度沉默并不反映他的真实思想。就职前，他两次拒绝同胡佛公开合作以协力解决战债、裁军与召开世界经济会议等外交问题，不是因为他对外交政策漠不关心，而是出于一种要将新政府同胡佛政府划清界线的个人考虑。他任命了主张自由贸易、反对经济战的科德尔·赫尔为国务卿，国际主义者威廉·菲利普斯为副国务卿，并同威尔逊总统的首席财政顾问和副国务卿、一位著名的国际主义者诺曼·戴维斯多次商讨解决上述国际问题的办法，随后任命他为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罗斯福让戴维斯在1933年5月25日向裁军会议代表们声明：倘若和平受到威胁，美国将同其他国家共同商讨对策；一旦出现事实上的侵略，美国将制止企图破坏集体努力的任何行动，以惩罚美国及其他国家一致公认的侵略者。"这项声明在4个星期内使人强烈地感到，罗斯福已经成为一心为促进国际和睦的世界领袖。在国内外人民的心目中，他已成为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倡导者，也是日内瓦谈判的核心人物。"此外，上任伊始的罗斯福还致力于将睦邻政策落到实处，以改变美国长期以来在拉美国家中丑陋的帝国主义形象。他主张推行"集体责任制"，不主张美国独断专行。他放弃了那种以武装干涉为中心的拉美政策。罗斯福还在1933年1月17日签署协议，与苏联正式建交，从而结束了自十月革命以来美国拒不承认苏联长达16年之久的不正常历史。前苏联学者亚·鲍·恰科夫斯基认为，"罗斯福按其教育、生活态度及其倾向性来说，都是一个资本主义者。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把美苏关系建立在睦邻、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罗斯福不像胡佛那样固守僵硬的意识形态阵地，而是一位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者。

长期以来，罗斯福形成了这样两个信念：一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即国家之间为了长期的繁荣与和平而互相信赖；二是一项有效的对外政策需要国内稳定牢靠的支持。换言之，他相信，美国经济的繁荣最终要依靠国外正常经济的恢复——通过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主要的贸易强国的共同合作才能实现的恢复。罗斯福清楚，繁荣与和平之间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一方面，他发现世界经济萧条和侵略问题是不易解决的；另一方面，他担心美国严重的困难和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是否允许他在海外作出任何行动。巴黎和会后，他运回到海德公园的那张威尔逊总统用于起草盟约的桌子，成了他上述两个信念不变的象征。

正值欧洲战云密布，世界笼罩在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之下时，美国举国上下却生活在一种浓郁的孤立主义氛围之中。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战争的危险、对如何阻止和打击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等这类问题漠不关心。他们倾身心地对付大萧条引起的无穷无尽的个人危难，厌倦和反感那些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国外的劝告。他们反对美国卷入欧洲那似乎是永无止境的恩怨和纠纷之中。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治·厄尔的主张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心理。他宣称："让我们把眼睛转向国内。如果世界将变成一个荒芜、仇恨和苦难的原野，那就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守护和保全我们自己的自由绿洲。"

孤立主义情绪是美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若探本溯源，它可上溯到国父华盛顿发表的《中立宣言》和《告别演说》。华盛顿谆谆告诫美国人要信守这样一条准则：即坚决不要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免使美国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华盛顿的遗训被历届国会奉为圭臬。此后的门罗主义福的近一个半世纪里，含义多变。它在普通国民中也具有广泛的影响。美国与多事

的欧陆间隔着大洋。当时没有国际航班，少数美国人出国就坐远洋轮船，从纽约到罗马最快也要10天，从加州到东京起码需半个月。二战前横渡大洋实属不易，天然的屏障给美国人一种地远心自安的保守、自重心理。

坚决反对美国卷入国际纠纷的言行和阻挠罗斯福可能迎击法西斯势力扩张侵略的活动，主要来自国会、内阁甚至罗斯福身边顾问中的孤立派。它们主要代表中西部和西部的农场主和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利益要求，它们反对那些与欧洲关系密切的东部大财团和英国的国际金融财团。此外，赫斯特报系、库格林神父、朗、三K党人、德裔美国人联盟以及少数民族中的法西斯组织等，都是坚决的孤立主义分子。

20年代的美国历史学家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料的重新发掘与研究，认为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卑鄙争夺，并与军火的制造和贸易息息相关。新闻界人士声称，美国及仆人民在1917年是被“发战争财的人和协约国宣传”两种势力气进了一场毫无价值的战斗事业中去的。舆论界的一些领袖甚至公开为他们在1917年把美国带进战争感到内疚，并决心永远不再滥用美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历史学家还论证说，一战和南北战争一样，是个悲剧性的大错。修正论者认为，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他们因此把布赖恩推崇为一战前外交活动的英杰。他们认为威尔逊发表的那些理想主义的声明，掩盖了谋取暴利者们恶劣的贪欲，而且全国都受到协约国巧妙宣传的摆布。参议员威廉·博拉等人则深信国际联盟“不过是欧洲军事机其中的一个齿轮”。还有不少人认为：如果要避免战争，就应当迁就希特勒，他要求生存空间似乎并非无理，他想把所有德国人联合在一面旗帜之下，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实行民族自决原则，做得比威尔逊在凡尔赛所做到的还要忠实。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美国人民普遍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深感失望。一场以牧师、妇女和大学生为主力军的和平主义运动在30年代得到了大发展。各级教科书极力贬低尚武的英雄人物，军事史几乎被取消，儿童们被劝告不要去作打仗的游戏。每年的五一劳动节都有数十万大中学生为和平而罢课、游行。不少知名的宗教界领袖加入了反省自己一战“罪行”的行列，他们纷纷在公众面前痛切地忏悔自己曾在某种意义上对一战的支持，并“毫无保留地答应永不重犯那种错误”。有一位评论家指出：所谓“永远不再”的誓言成为30年代的一种风气，恰如宣布禁酒之前人们纷纷发誓戒酒一样。

国内孤立派对新上任的罗斯福总统戒心极重，因为他们对罗斯福的成长史、背景、从政经历、言论等了如指掌。他们在罗斯福上任不久，就进行了一次有关武器贸易及其在世界政治中有害影响的调查。1934年4月，参议院又成立了以著名孤立派北达科他州共和党人杰拉尔德·奈为首的调查军火工业的特别委员会。调查对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火制造商和银行家。如此重提陈年老帐，目的在于给罗斯福来个“敲山震虎”。该调查委员会得出了令国民震惊的结论：美国在1917年参加欧洲战争既非保卫本国的利益；又非捍卫民主制以拯救世界，而是那些军火利益集团和金融家们施展阴谋诡计而招致的结果。该委员会同时发掘了不少耸人听闻的证据材料，以支持、佐证上述结论。这就使美国公众轻易地得出结论，即认为华尔街为牟取暴利而需要战争。《芝加哥论坛报》、赫斯特报系以及一些历史学家和作家顺势推波助澜，使很大一部分公众舆论变成一种极其天真的意见，认为美国上次被怂恿着卷入战争，为的只是让“死亡商人”发财，我们若再干预任何未来的欧洲战争就等于犯罪。



由于受到如此强烈的掣肘，更由于国内大萧条的深重局面等待收拾、整顿，罗斯福在第一个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没有多大的自主性或可供他发挥的余地。更深一层的原因是：罗斯福1932年竞选胜利所付的部分代价——即无条件地反对美国同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努力进行合作和奉行建立在不卷入国外纠纷基础上的谨慎的中立政策——使他很难立即在当选后回归到真实的自我，充其量只能做一个遮遮掩掩的“私下的国际主义者”。而在表面上，他只能身不由己地随着1932年的惯性下滑。这是一种“在一个没有门的墙上去找一扇门”的景况。于是，在很多公共场合，他合着孤立主义者的调门泛泛而谈美国的外交政策。他甚至担心，值此政策气候下，外交上的轻举妄动将会损害他那来之不易的政治上所受的拥戴和他那心爱而又优先的国内政策纲领。因此，他对于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的冷漠和打击、他对于胡佛的国联和战争贷款政策的继续贯彻，以及他听任国会通过空前的高额保护关税，都是善于见风使舵的罗斯福总统权衡利弊后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结果。从倾向性上看，它们是一种从原有的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退却。总之，这一切，都可概称为“罗斯福的现实主义”。

有一个插曲似乎说明罗斯福并未甘心一味地退却。当他根据一份详细的调查得知，将有大约2/3以上的议员赞成美国参加国际法庭时，他立即在1935年1月要求参议院批准该法案。可是，他的要求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以库格林神父和赫斯特报系为首的孤立主义势力大造舆论攻势，把国际法庭说成是与国际联盟一样的可怕的组织，是国际银行家和财阀的罪恶工具，恪守传统准则的美国万万不可进入这间房子。这种煽动立竿见影，全国各地的抗议信件、电报如同雪片般飞向国会，邮差用手推车把它们不断地送到参议院办公室。同时，强大的院外集团成员在为反对此法案通过而四处活动。这样，参议员中的反对派由最初的10名增加到36名。罗斯福的情报失灵了。该法案以7票之差未获2/3多数。

罗斯福又一次地领教了孤立主义势力的厉害。这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总统，他在外交事务中暂时还不能随意行动。他只能在斡旋中等待，或者在适宜的时候进行解释和引导。

罗伯特·达莱克认为，孤立主义者反对参加国际法庭的呼声拨动了当时美国国内几根绷得最紧的琴弦：它有力地奏出了美国对欧洲赖帐不还的行程的满腔怒意；奏出了唯恐欧洲不顾美国利益把它拖入又一次战争的忧虑；奏出了奈领导的调查委员会揭露的事实真相使人们产生的信念；奏出了对战争将令人不能容忍地把美国的民主制度最后拖垮的担心。不久，沃尔特·米利斯撰写的《通向战争之路：1914—1917年的美国》一书出版并迅速风行全国。该书是一部具有强烈的历史借鉴意义的战争警世录，人们不难从中认识到：美国本来是可以避免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如果当初有一部严格的中立法案的话。无疑，该书无异于给业已高涨的孤立主义情绪火上浇油，致使“群众情绪如此强烈，某种中立法已不可避免；剩下的问题只是国会要不要把外交政策的控制权从总统手里夺过来。”

同时，欧洲局势的日趋恶化使孤立主义者顿生一种紧迫感，即立即制定一项中立法案或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避免美国卷入战争。1935年3月，纳粹德国不顾任何方面的反对，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在和平时期建立拥有36个师、约50万人的正规军。希特勒政府还正式宣布，德国在军备方面将不再受《凡尔赛条约》的约束。对此，英法政府只能在形式上表

示抗议和遗憾。是年，德军举行了以进军莱茵区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其国防军司令部制订了代号为“红色”的对法作战方案和入侵奥地利的“奥托方案”，以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而信奉“做羊百日，不如当狮一天”的墨索里尼则通过苏伊士运河源源不断地向东非集结军队，这年10月3日，意大利法西斯不宣而战，越过马雷布河边界，从南北两方大举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日本法西斯在这年的4月以后，紧锣密鼓地制造了旨在侵吞中国华北5省的“华北事变”。

国会加紧了行动。它不仅没有给罗斯福自主行事的权力（这使罗斯福在这年春夏试图采取集体行动的希望迅速化为泡影），而且，由于报纸头条新闻充斥着埃塞俄比亚战争动向的消息，国会不捆住总统的手就不休会。议员们向国会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主张严守中立的运动开始活跃起来。罗斯福气初试图把决定中立的问题从外交委员会那里夺过来，以防止国会通过一项无区别对待的严守中立法案，但此举立即引起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们的强烈不满和抗议。4月初，杰拉尔德·奈通知罗斯福说，负责调查军火贸易的特别委员会将把中立问题交给外交委员会去处理。于是，罗斯福又设法采取其他行动以阻止国会。他虽然认为有区别对待的灵活的中立法是上策，但他意识到要让国会通过这样的提案是不可能的奢望。因此，他要求参议员皮特曼把提交外交委员会的全部中立法案搁置起来。

然而，全国上下都极其担心日趋恶化的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的紧张局势会成为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因此，要求制定中立法案的压力继续增大。全国各类和平运动组织和反战组织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要求制订严守中立法案的运动。这种情势已迫使国会领导人发现，国会再也不能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了。

罗斯福当然希望获得总统灵活应对的外交权限，以惩罚意大利，并向德日两国示威，表示美国将同其他民主国家一道反对任何地区的侵略。但他深知，国会和美国人民无意在国外采取大胆行动。如果他坚持推行自己的观点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话，就会影响1935年夏“第二次百日新政”期间他正在设法使国会通过的部分立法计划。事实正朝罗斯福所担忧的局面发展。8月20日，以参议员博恩、克拉克、奈、朗和范登堡为首的孤立主义者开始阻挠任何议案的通过，“他们发誓要这样做，直到参议院通过一项强制性的严守中立法案为止。”

这样，参议院在次日仅仅经过25分钟的讨论，就一致投普通过了由皮特曼提出的一项妥协法案。它规定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但它授权总统确定哪些属于军需品和什么时候实施禁运；它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送军火；它授权总统不保护乘坐交战国轮船旅行的美国人；它规定建立一个军火管理委员会来监督从美国运出的武器。8月31日，罗斯福总统予以签署。曾两度支持罗斯福竞选总统的加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兴奋异常，他说：“今天就是所谓孤立主义者胜利之日，今天也记下了国际派的垮台。”

其实，这项中立法是无论哪一方都不满意的决议，它通过折衷后规定的有效期仅为半年（到1936年2月29日终止）。其意图十分明显，即主要地用来在国会休会期间约束总统。舍伍德指出，罗斯福“勉强”签署了这个纯属追溯性的法律。它的制订是出于一种信念，似乎美国能靠立法手续来避免战争。它与禁酒法差不多，是一种“动机高尚”，但后果极坏的试验。1

1936年2月，国会将1935年的中立法延长1年。由于仍居优势的孤立主义者内部也有分裂，所以1935年中立法未能更进一步地修改为真正严格的中立法。它除了重申原来的规定外，还禁止给交战国贷款；对新加入战争行列的国家，总统不能行使自由处置权，而应执行强制性武器禁运。这两个中立法都得到公众的普遍支持。

1936年大选前几个月的罗斯福显然不能逆流而上。8月14日，他在纽约肖托夸夏季讲学中心发表了“我痛恨战争”的演说。他首次公开承认，在过去几个月里，他个人对国际状况比对当前国内前景更为关注，而且更不乐观。他表示自己把每天24小时的相当一部分用于研究外交关系。随后他向听众保证：“我们避免承担可能使我们卷入国外战争的政治义务；我们回避同国际联盟的政治活动发生联系。……为了思考和筹划如何使我国不至卷入战争，我已经用了不知多少时间，而且还要继续使用不知多少时间。我但愿能使所有的国家都不受战争之苦；然而那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我至少可以确保：美国的任何行动都不至于引起或促成战争。”罗斯福还以令听者为之动容的语言追述了自己在一战中那不堪回首的经历和见闻，随即发出了“我憎恨战争”的话语。演说经过媒体的传播，立即在美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这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德、意法西斯公开进行武装干涉，以帮助佛朗哥击败共和国军和建立法西斯政权。罗斯福政府于8月7日发表了不干涉西班牙的声明。罗斯福这时的表现一度比某些鼓吹中立法的人更带有孤立主义色彩。他接受了英、法的观点，即只有严格的不干涉，才有希望使西班牙战争局部化，从而避免一场可怕的世界大战。他对帮助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摆脱法西斯统治已兴趣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兴趣了。和伦敦一样，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避免使西班牙战争发展成全面的欧洲战争。”他主动向国会提议修改中立法，把武器禁运扩大到适用于发生内战的国家。国会遂于1937年1月正式通过了补充中立法，对西班牙内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这就等于把西班牙的内战看成仿佛是两个有同等权利的外国的冲突，而不是一场反对公认的政府（并且是与美国早就有外交关系的民主政府）的暴乱。当泽西城的一位出口商运送一批飞机和军火给忠于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组织时，罗斯福严厉地斥责了他，说他“完全没有爱国心”。此时正值1936年大选的最后紧要关头，罗斯福更加急于赢得和平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天主教徒的支持。他甚至写信给美国驻欧洲各国的外交官员，要求他们回国为这次大选出力。

罗斯福在1936年与孤立主义者的“握手言欢”具有多重意义。表面上看来，它似乎主要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竞选策略，是一种似乎有违罗斯福真实意愿的实用易行的权宜之策。罗斯福也乐意被人这样看待，他甚至乐意宣称目前他的外交政策是他更大、更深远的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或必需的阶段。实际上，它是罗斯福一贯具有的政治起色的又一次体现，他从来不肯公然将自己安排到易受攻击的阵营分明的地带。不到万不得已从不肯暴露自己，这是他“如狐狸般狡猾的一面”。他发现这样做，其政治上的好处要大于不这样做，更远远大于反其道而行之。赫尔国务卿后来承认：“这一次，我们的立场对于明显对立的孤立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来说，似乎是都能接受的。孤立主义者赞成我们，是因为我们避开了战争；国际主义者赞成我们，是因为我们同英法合作。”此外，1936年的罗斯福还希望通过接受甚至

主动要求修订中立法这些举动，来消除全国对总统拥有过大的控制权而日益增长的忧虑。总统的权力随着新政纲领的实施而不断扩大，人们认为只有严格限制总统的决定权，才能避免再次发生上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事件。现在他主张对西班牙实施禁运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制止一场欧洲战争。由于为和平而作的这一点努力不需要美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所以在国内也几乎完全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罗伯特·达莱克揣摸着处于大选冲刺阶段的罗斯福，一定会为这种何乐而不为的做法感到得意。1936年的大选似乎证实罗斯福的策略是有效的。

他比对手多出1100万张选票数，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由于他对外交事务即和平问题的处理，大大增加了他的选票数。充其量是因为他确保了一些在国内问题上支持他的人，在担心卷入未来战争的问题上没有背其他，从而抵消了一个潜在的爆炸性问题。

至于经罗斯福提议而于1937年1月通过的补充中立法，对西班牙内战中的佛朗哥一方而言，最起码是无害的。因为支持佛朗哥的德意法西斯国家仍可由美国购买军火，罗斯福自己也承认：“佛朗哥的飞机在巴塞罗那平民的头上投下了美国制造的炸弹。这些炸弹是由美国厂商卖给德国政府或德国公民（这是合法的）而运往德国，然后又转运去西班牙给佛朗哥的。”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一方则不能从美国购买军火了，它只能有限地从俄国和法国那里得到援助，但为时不久。佛朗哥本人夸奖罗斯福“总统的行为像一个真正的君子，他的中立法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姿态。”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绥靖主义的效果，它有利于佛朗哥势力的壮大，也有利于德意法西斯实施其战争意图。

按说罗斯福在竞选连任获胜后，会矫正自己在1936年的外交事务上的行为。但事实是，直到1937年10月为止，他基本上表现得同1936年没有什么两样，或者说起色不大。从再次就任总统到10月份，罗斯福致力于他那蓄谋已久的“改造法院”的计划的实施，随即陷入了几乎无法自拔的斗争和泥淖之中。他认为，维护被最高法院陆续否决的新政立法，就是在防止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可能出现，就是在拯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就是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因为他坚信有效的对外政策需要国内稳定可靠的支持。但是，张伯伦在1937年3月致小亨利·摩根索说：“英王陛下政府……完全相信，美国在当前能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修订现行的中立法……。目前这个中立法对侵略者包含着间接的和潜在的鼓励。因此，人们殷切希望能想办法授予总统足够的处置权，以便总统对每件事酌情处理。”罗斯福对张伯伦的说法极为敏感，此时他不能也不便在国会通过的法案之外要求更多的东西。因为此刻正值他竭尽全力“艰苦地”进行改组最高法院的斗争时期，庞杂的反对派称他为破坏宪法和法院的“冷酷独裁者”，故处于不利地位的罗斯福难以开口要求给予政府更多的外交控制权。海勒姆·约翰逊在谈到中立法时声称：“我要设法防止总统阴谋夺取……制造战争的权力……既然他已经把手伸到了最高法院，……他实际上已使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的独裁者。”确实，总统手脚有些不便。

### 美国牌绥靖

1936年8月26日，《纽约时报》登载了阿瑟·克罗克的一篇文章。该文称，罗斯福如果在11月再度当选的话，就打算召集一次各国首脑会议

并将和平裁军问题纳入议程，会议还将讨论排除贸易障碍和普遍降低关税壁垒等问题，总统希望世界舆论来支持他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克罗克最后强调，总统尚未明确决定施行他的方案，因为这主要看“各种外交试探的反映，这些试探将在实际发出邀请照会之前进行。”

罗斯福当时确有此打算。但正如他在对待“改造法院”那件事上的手法一样，他宁可将这些尚未明确的方案透露给个别新闻记者，也不愿较早地让政府内阁知道。果然，国务院对克罗克的报道十分惊讶。罗斯福这时则通过他任命的那些驻欧洲各国的大使获悉情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试图进行各种“外交试探”。由于驻欧洲各国大使提供的观察分析的角度不一，更由于各大使自身的主观判断和信念方面的差异，罗斯福很难在这些出入较大的情报分析材料面前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并进而据此确定某一种外交方案。

美国驻柏林大使威廉·E·多德和一些观察家向罗斯福指出，德国国内经济的严重困难和畸性发展将是引发战争的最重要根源。美国驻华沙大使也在罗斯福再度当选后不久向总统汇报说，由于为德国出口寻求市场的失败和对战备必需物资进口的限制，德国的经济状况不佳，人民生活水准下降。这种痛苦的加剧必将出现社会动荡，除非德国能得到某种补偿，除非采取某些措施来解除德国经济状况的困难，并以此换得德国保证停止或削减巨大的“重整军备计划”。罗斯福显然受到很大启发，他担心巨大的经济压力将使德国未来的经济危机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克服，“在这种局势下经济上的根本弊病更加恶化，它意味着每当一次新的危机出现就有更大的困难。”受到这种担心的影响，国务院在1937年2月16日拟定了一份说明欧洲问题实质的备忘录，“能否找到一个妥协方案，或付出某种代价，以满足德国人民的经济需要而不致发生战争，或不致使德国在欧洲大陆称雄呢？”备忘录认为可以用让德国有获得原料机会的办法来避免战争，并把对于军国主义和纳粹激进主义的支持归之于德国人民在经济上的缺乏保障。因此，“德国对殖民地的要求不能被视为完全不合理而予以拒绝，而且保证德国经济复兴的可能性也要予以考虑，对此美国应尽一份责任”。备忘录指出，美国干预欧洲事务的目的“将在于推进一场运动，以达成一项普遍的政治和经济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将使德国不必再为从市场上获得德国领袖认为保持德国人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原料来源而奋力拼搏”。备忘录还希望英国能够在满足德国的要求上与美国进行合作。

这份备忘录与罗斯福的那种基于担心而形成的息事宁人的思路是一致的，它旨在通过满足或部分满足德国的要价和胃口、通过给德国以某种“补偿”、“安抚”和“付出某种代价”、“妥协”等方案，以达到消除战争根源、实现世界和平的目的。这种思路使美国采取了对德国法西斯的绥靖政策。或者说，这些设想及平方案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美国牌的绥靖主义。

导致罗斯福形成这一思路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受到了德国内部“稳健派”的影响。当时，与纳粹党内的戈培尔、里宾特洛甫、罗森堡等“极端分子”或“好战分子”不同，德国另有一个主要由实业家、陆军总参谋部和高级文官组成的“稳健派”，其代言人是德国经济部长兼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沙赫特似乎一直在寻求一种不通过战争而使德国摆脱经济困难的途径，他与驻柏林的各大国的大使有着广泛的接触，他的努力得到了德国外交部和德国陆军的支持，沙赫特甚至希望由美国出面召集一次会议来讨论德国的殖民地等要价，这恰好与罗斯福打算召开一次各国首脑会议的设想不谋而合。

这样就更加坚定了罗斯福对这一设想的信念。1937年1月，他向摩根索透露了依照他的思路而设计的笼统计划，即建立一个国际卡特来供给德国所需的原料，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殖民地物质将用来雇佣目前正在从事军火生产的德国工人——这将使军备受到限制而又不致造成德国工人失业和国内矛盾激化。

几乎与此同时，沙赫特在《外交事务》上撰文，呼吁美国应鼓励绥靖以刺激经济恢复，他说如果没有德国的繁荣，欧洲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而不论美国多么希望站在一边，但无疑欧洲繁荣的消长对它是至关重要的。他进而论证道：“如果德国能够获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经济上得到发展，这只会有助于刺激一般的世界贸易。它将帮助增加消费，促进繁荣，它将不仅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将提高整个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平。”沙赫特还暗示，希特勒元首诚恳地希望和平与裁军，但伦敦方面对德国的提议不予理睬。如果其他国家也同英国一样，德国将用品他手段来实现其要求。沙赫特建议美国向英国人指出，希特勒“对于最终地和适当地清理德国面临的各项问题是感兴趣的。”

沙赫特的言论及其活动不能不对罗斯福甚至赫尔国务卿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在此之前，罗斯福曾征求多德大使的意见：“如果我以个人名义秘密地询问希特勒，请他概述一下德国对外政策目标在10年之内的限度，并请他陈述是否赞同一项普遍限制军备的建设，那情况将会如何？”此时，对纳粹德国和希特勒已有切身体验的多德大使警告罗斯福：近1年来的欧洲所发生的事件已证明了共同的一点，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打算统治整个欧洲。”罗斯福派出的驻巴黎大使布利特则相对乐观地认为，美国应促进法德关系的缓和，不过他劝罗斯福要小心行事，不要召集一个缺乏充分准备的首脑会议。

德国国内的所谓“稳健派”及其言行。干扰了罗斯福审视纳粹德国的视线。如果说罗斯福在以压倒性多数重新当选后，“决心寻找某些比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上曾经采取过的更为持久的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法”的话。那么，美国采取行动的前提条件或“先决条件”就是：一要依赖于同英国的事先协议和步调一致；二要依赖于德国长久存在一个“稳健派”，并且这个“稳健派”还须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地位去影响、说服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接受以谈判方式解决德国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或者，这个“稳健派”必须强大得足以压倒纳粹政府内的“极端好战派”。显而易见，罗斯福的良好设想带有极大的虚妄性，它起码与德国国内的实情不符。

对此，美国国内的“反绥靖主义者”们早就清醒地向罗斯福点明了最后这一点。曾任美国驻柏林总领事和奥地利大使的乔治·梅塞史密斯在1933年就警告说希特勒及其许多同伙都是以不同面目出现的战争狂人和“精神病患者”。他认为所谓“稳健派”尽管能发表意见，但在德国政府中没有“决定性的发言权”。纳粹政权只是为了说服英、法、美去帮助它摆脱经济困境，才在1936年显示出“一种克制的态度”。而一旦德国经济得到加强，殖民地要求得到满足，纳粹运动的实质就会暴露，希特勒就会发动他的战争机器。因此，梅塞史密斯论证道，与沙赫特的谈判将是“危险的而且对美国的最高利益是有害的”。美国不应去促进绥靖，而应拒绝对希特勒提供经济帮助并鼓励英、法组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纳粹政权在起军事扩张遭到遏止并被日趋恶化的经济削弱后，最终将被陆军所推翻，陆军将组建一个美国可以真正与之打交道的“稳健”的政府。而在此之前，所有的努力无异于与虎谋皮。

多德大使虽然力求同沙赫德这样的"稳健派"建立友谊，但他们怀疑他们是否对一个罪恶的从事于战争的政权有很大的影响。他根据1936年10月德意"柏林协定"和次年德意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制定过程，得出结论认为，戈培尔、里宾特洛甫和罗森堡之流对希特勒的影响才是主要的。

为了逐步落实自己的计划，罗斯福先后委派了约瑟夫·E·戴维斯和诺曼·戴维斯前往欧洲去探询此举的可行性以及英国的态度。前者通过与沙赫特的非正式性会晤，向罗斯福发回了一份令人乐观的报告。报告中表明，沙赫特正受希特勒之委托在寻求一种以限制军备和归还殖民地为基础的欧洲和解，而罗斯福则完全可以通过在华盛顿召开一次和平会议来帮助希特勒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沙赫特还就德国国内的军国主义和迫害犹太人问题向戴维斯作了"满意的"解释。他说，这些不过是"一个民族处于绝望和可怕的困境时的表现，这个民族受到压抑，并在一个丰裕的世界中正在经济上被人饿死。"而一旦德国享有公平与繁荣后，这些表现就会完全消失。后者即诺曼·戴维斯被派往伦敦考察英国对于限制军备和一揽子解决欧洲问题的态度。而此时(1937年初)的英国，已经在通盘考虑以沙赫特的要求为基础解决欧洲问题的可能性。并且，尚是斯坦利·鲍尔温内阁的财政大臣但显然将成为首相接班人的内维尔·张伯伦，同罗斯福一样，迫切想与沙赫特为代表的"稳健派"交往。他甚至认为，德国国内有一派愿意恢复良好的国际关系并用此来克服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而如果不能防止德国经济走向崩溃或满足希特勒所要求得到的公正，德国将发动一场英国所害怕的战争。张伯伦在出任首相前不久的内阁会议上，赢得了一项赞成考虑德国获取殖民地要求的决定。起计划最后定型时，与罗斯福在1937年1月对摩根索透露的设想竟如出一辙。但总的来讲，于是年5月出任首相的张伯伦对与美国紧密合作的前景持怀疑态度，他承认英美在当前的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在理论上是有益处的，但他更认识到把这样一个意向性的计划付诸实现尚有种种困难。同时，他对于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和后来的海军谈判期间所经历的一切记忆犹新，他从中对罗斯福和美国的政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或戒备心理。他因此觉得罗斯福和平倡议的价值大可怀疑。最好的情况是，罗斯福也许会召集一次会议，但是在孤立主义的压力下又可能被迫退出(他认为罗斯福1936年的许多行为都有类似的意味)，从而会破坏英国的绥靖政策并使英国单枪匹马地对付德国。他对戴维斯等人说："倘若事物只是(美国人)参加进来然后再扬长而去，我宁愿(他们)干脆永远也别参加进来。"另外，英美这两个贸易大国推行的"截然相反"的经济政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贸易磨擦，也成为英美在进行绥靖方面密切合作的障碍。

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罗斯福的和平提议。他极力鼓励美国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他认为这将可能对希特勒等战争狂人们起一种威慑作用。

他告诉美国驻英国大使罗伯特·宾厄姆，如果要想维护和平，那么让柏林知道罗斯福对英国和法国的同情是十分重要的——能体现这一点的最好的具体形式就是美国修改中立法，使之在一旦发生战争时不利于侵略者，因为这将旗帜鲜明地表明美国雄厚的经济资源是民主国家的后盾。即使美国国会不可能这样做，则退而求其次，艾登也愿意欢迎任何其他能证明英美团结的可行的做法。他认为如果罗斯福提出他那个广泛"谣传中的"和平倡议，那么英国也应同美国合作。最好的情况是希特勒将被迫采取合作的态度，因为

他知道如果拒绝合作，美国的舆论就会作出反对德国的反应。最好的情况是，如果罗斯福的提议遭到柏林的拒绝，美国公众也许就会愿意支持美国在集体安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艾登精明地论证道，一次会议也许不会成功，“但如果作了这样的尝试，而尝试的失败则是独裁国家的过失，那么这对教育世界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的进程将是有益的。无论如何，如果我们给总统的想法泼冷水，那显然是个大错误。”但是，艾登向 宾厄姆指出，等到英国重整军备完成之后再召开由美国首倡的和平会议，这样将更有效果。

## 第九部：走向遏制与对抗

在第二届任期内，纷乱繁杂的诸般事务接踵而至。1937年8月，似曾相识的灾难又一次袭来。尽管全国表面上顺利地在新政的指导下走向复兴，但经济却迅猛地衰退。产业活动以美国历史上最惨的跌幅下降。到12月，《纽约时报》上的工商业指数从110猛跌到85，将1935年以来的成绩一扫而光。3个月内，钢产量从生产能力的80%降低到19%。抛售浪潮冲击着股票市场：1天之内，700万股以上的股票易手，股票交易登录器的纸带远远跟不上，道—琼斯指数突然跌落；曼哈顿的夜总会停了；新汽车在展销室里囤积起来；黄金外流。从9月到年底又有200万人失去了工作。1938年初，商业指数继续下降。很多美国人再次濒于饥寒交迫之境。纳粹德国的《进攻报》幸灾乐祸地指出，美国克利夫兰市的苦难提供了民主制度软弱无能的又一例证。失业人数在年初几个月里又增加了400万。新闻界人士像他们一度写过胡佛和艰难岁月那样，开始书写“罗斯福萧条”了。

政府内部正为“衰退”及其对策而激烈地争执不下，他们围绕着财政预算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纠缠不休，分裂为“正统派”、“保守派”、“凯恩斯派”、“布兰代斯派”等。罗斯福则有些左右为难，他知道目前的情况比1932年要好得多，人们是“困惑多于恐惧”，但他就是找不到阻止经济继续下滑的方法。摩根索劝他呆在原地静观事态发展的头绪，他认为也只好如此。同时，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计划和对待静坐罢工的政策，“两相结合，呈现出摧毁罗斯福联盟的中产阶级基础之势”。产联领袖约翰·刘易斯辛辣地嘲讽罗斯福对待劳工的“不岂不倚的态度”，说这个在1936年大选时在工人餐桌上觅过食的人现在却知恩不报，背信弃义。总之，这几件大事交织在一起，削减了罗斯福在国会的权威，有助于反对派联盟的壮大，并使总统的威信在1938年降低到了似乎是他上任以来的最低点。

罗斯福招致了多方人士的怨恨和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有增无减。任何能够同他沾上边的事都可以被用来作为诋毁他的素材。他的家庭私事也是被报界大肆渲染。诸如他的小儿子在学校目无纲纪地闹事、违反交通规则啦，詹姆斯不择手段地迫使农场主签署承保单啦，埃利奥特打着父亲的旗号招摇撞平地做生意啦，尤其是他的子女们此起彼伏的离婚和结婚案，更是被报界给弄得沸沸扬扬（罗斯福总统的4子1女先后结婚共18次）。还有比这更为等而下之的关于总统及其家人的污言秽语。十几年后，约翰·根室写



道：“当时反对罗斯福的流言蜚语反映了阴暗敌对情绪，而对他的造谣中伤又是多么阴险毒辣。”

人心的背离是否已经上升为主流现象？在1938年夏季的一次全国性调查中，被征询者中只有一半人表示愿意选举罗斯福，如果当时就要求他们投票的话。休·约翰逊得意地宣称：“旧日罗斯福的魅力已经失去它振奋人心的刺激力，这支福斯塔夫式军队的各式部分，再也不能团结在一起，用悦耳的嘶声和胜利的微笑来率领了。”伯恩斯认为，在1938年罗斯福声望下降到最低点时，他仍然拥有大体上过半数的人民的支持。所不同的是，罗斯福在第一届任期内经常给人甚得民心的印象，在1938年已不复存在了。这种舆情和民心使罗斯福进退维谷。他的巨大力量寓于他个人的政治脾性之中，在于他还能对选民产生魔术般的吸引力。他的弱点在于许多人对他表面上强大的政治权力感到担心。“另外，在黑人、穷人、中下层、中上层和富人这五大阶层中，除前两个阶层外，其他几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对总统的经济政策表示反对和怀疑。

## 第十部：胜利大夫

1941年12月7日中午，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总统的办公桌上共进午餐。饭后，两人一边吃着甜点，一边谈着战争以外的话题。1时40分，电话机叮呤呤地响了……

诺克斯部长在电话里说，他无意间收听到檀香山美军司令部的无线电广播，通知我们所有的台站，现在日军的空袭正在继续中，并且说“这不是演习”。几十分钟后，海军参谋长哈罗德·斯塔克打来电话，证实袭击是确实的，并且损失惨重。消息在数小时内传遍了华盛顿。

当晚，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挤满了神色冷峻的人群，少数人低声唱着《上帝保佑美国》，大多数只是默然地望着眼前的白宫。其实从外面看去，白宫和平时一样，灯光黯淡，窗帘低垂。

此时，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全体阁员围着罗斯福总统坐成一圈，正在召开自林肯在南北战争爆发时召集内阁会议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内阁会议。与会的珀金斯部长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与直感观察到：总统在听到进一步证实的受损消息时，出现了极其难过的片刻和体力不支的困难，但随即在他身上出现了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迹象——“长期紧张地猜测日本会采取什么行动，什么时候动手，我们要不要在没有明显攻击我们时去保卫新加坡……这一切问题折磨了他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现在终于都结束了”——一种他所不愿意承认的“阵阵轻松感”在他那难以捉摸的脸部表情上得到反应：一张既紧张又镇静的脸部表情。

埃莉诺后来也谈到，那天“富兰克林显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所没有过的宁静沉着”。据霍普金斯说，总统认为要和平还是要战争，已经“完全不由他来作主了，因为日本人已替他作了决定”。他一直以为日本人会尽力避免同美国打仗，而只对其他太平洋国家采取行动，这样就给他留下一个“保卫我们利益的非常难办的问题。所以，日本采用的方法使他如释重负。尽管珍

珍珠港发生了不幸的灾难……，但这一事件把美国人完全团结起来，从而使对日战争成为必然。“情形或许正是这样：罗斯福首先肯定是沉浸在由震惊而引发的悲恸和愤怒中，继而转念，然后就如释重负了。当时他一动不动地坐了整整18分钟——”也许是在祈祷，也许是在盘算，或者只是定定神，以适应新形势。”

在以后几年尤其是在战后，人们愈益强烈地要求知道何以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批评罗斯福政府的人指出，是我们的总统处心积虑地刺激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并把它作为通向欧洲战争的“后门”。他们甚至暗示，罗斯福已预料到珍珠港袭击，却偏偏封锁消息，让驻军蒙在鼓里，以图用这种惨重的苦肉计来确保国内的同仇敌忾。战后有一次“最彻底的”的调查，国会所收集的证词和报告共达40卷。史汀生后来在向国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解释说，我们得等到战争爆发，尽管要“冒让日本人打第一枪的风险，但我们意识到，为了得到全国人民的全体支持，最理想的是让人们看清日本人是真正的肇事者。”不过，一般认为，政府的责任仅在于疏忽大意。

罗斯福在次日晚向全国广播的“炉边谈话”中，诚挚地劝告美国同胞们不要听信任何谣言。他说在战时，这一类关于灾难的丑恶小道消息具有数量多和传播快的特点，我们对它们一定要进行分析和判断。“我们不妨承认，我们的敌人表演了一次卓越的欺骗技巧——时机配合得恰好，手段也很高超。它是一次无耻透顶的行动，然而我们必须正视，以纳粹的方式进行的现代战争本来就是肮脏的勾当。我们并不喜爱它——我们未曾想要卷进去——然而我们已经卷进来了。”

丘吉尔倒是大大舒了一口气。7日下午，他通过越洋电话向罗斯福证实了情况后说，“这肯定使事情简单化了。”罗斯福回答说，“我们现在风雨同舟了。”丘吉尔后来写道：“有美国同我们站在一起，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喜悦……值此时刻，我知道美国已经参战了，并且已经深深地卷进来了。对于结局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怀疑了……我百感交集，上床为我们得救和感恩安然睡了一觉。”白宫的总统是在12点半上床睡觉的。

12月8日，罗斯福前往国会作了不久就举世皆知的名为“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的演说。作为他的历史感的一个证据，他请求罗斯福夫人陪伴伍德罗·威尔逊夫人参加这次两院联席会议。罗斯福顺着斜坡走上讲坛，以极大的克制，用品实舒缓的语言陈述了日军在24小时内的所作所为；并郑重指出，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希望维系和平而蓄意对合众国进行了欺骗。他最后请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进行无缘无故和卑鄙怯懦的进攻时期，合众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没有过多的渲染，演说历时6分钟。

参众两院几乎以全普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只在众议院有1张反对票。同日，英国对日宣战。9日，中国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次日又对德国宣战。紧接着，对日宣战的国家增加到20多个。11日，德国对美国宣战，意大利也紧随其后。

美国的参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最后的阵营结构。它已成为西方两个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同社会主义的苏联结成公开宣布了的或心照不宣的同盟所进行的联合战斗。这种搭配是被一系列的历史偶发事件推到一起的。尽管过去岁月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彼此都留下了大量的不信任情绪、偏见和敌意，但此刻已显得次要。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都面临着共同的对手。

严峻的形势促使观念发生变化。三人为建立协调的战斗合作，都从不同侧面并以不同方式进行了不懈的、坚忍不拔的和真诚的努力，虽然也不时在自重和疏远中，彼此感到过失望，但这种携手使他们比肩而立立于浊世恶浪中一直到终局，从而更衬托出他们不愧为非凡时代的历史巨人。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尽英雄本色。

## 战时体制

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两年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幽默地对记者们说，自1933年以来，“新政大夫”这个内科专家把美国的急性内科病医治好了。可这个康复了的病人在1941年12月7日，因一场严重意外事故折断了骨头，“新政大夫”于是就把病人让给“胜利大夫”这个外科专家。

战争使美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其全面性和深远的意义，直到战后才被美国人逐渐体会到。它无微不至地、不可抗拒地延展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一切的运转围绕着赢得战争胜利这一中轴。总动员开始了。观察家们发现，罗斯福“表现了掌握和控制十分紧迫的事态的高超才干，而这正是一位政治家最难能可贵的特点”。他“显得有条不紊，镇定自若，心情愉快，神态庄重，不知疲倦而又满怀信心。”孤立主义势力已烟消云散，从前处处与他作梗的人也大大地收敛了敌意。另一方面，罗斯福本人也注意到要维护国内的安定团结。他认为在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利己政治”是万恶之首，于是他立即暂停那些存在着分歧和极易导致分歧的国内政治活动，尤其是“新政”式的改革和党派政治活动。不过，罗斯福仅仅是强调了战争与内政之间的轻重缓急，“在危机时刻，我们不可能既是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未来的设计者”，他并没有将两者截然割裂，而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强调两者在终极意义上的基本统一性——都是为了拯救人类文明或民主政治。珍珠港事件激起全国的团结精神，这种精神保证了人民自愿入伍、配给供应和经济统制，罗斯福在这种情势下更能显示出战时统帅的作用。同时，这种情势也使罗斯福更自然地把人民的战争观同新政的自由民主价值联系起来。乔纳森·凡尼尔斯写道：“在他那个时代里，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在美国人惊惧之时，能唤起美国人的内在信心。由于他深信美国人的自尊感，所以他要求或者期望美国人拿出勇气来的时候从来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美国宣战后立即展开了规模浩大的重整军备运动。国会迅速废止了禁止将应征入伍者派赴西半球以外的规定，并规定服役期延长到战争结束后6个月。新兵役法还规定所有20岁至44岁的男子进行兵役登记，年龄在45岁至65岁的男子进行后备劳务登记。这样在征兵局登记者共达3100万人，其中1000万人经严格的体格和智力检查而被征召入伍。战争期间在各种武装部队中服役的人数，共达1500多万（含志愿兵），其中计有陆军1000万人，海军和海岸警卫队400万人，海军陆战队60万人，妇女服军役者约21.6万，黑人入伍者117万。空军力量也急剧地得到增强，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美国陆军航空队不足30万人，能适应作战的飞机不过1500架，而大战结束时在陆军航空队服役的人员高达230万，飞机7万架。海军也迅速发展为世界上最强大者，海军在编人员在4年不到的时间内增加了10倍，它所拥有的各类舰船增加到91000艘，为1941年底的20倍。

## 尾声：丁香满园时

“昆西号”巡洋舰载着罗斯福一行经苏伊士运河——亚历山大抵达阿尔及尔。疲惫的罗斯福和助手们得在航行期间拟定向国会发表的关于雅尔塔会议的讲话稿。在横渡大西洋的9天间，他们为此忙个不停。“昆西号”驶出阿尔及尔两天后，沃森老爹病逝于船舱里。临死前，他要求成为天主教徒，随神父主持了皈依仪式。罗斯福守在一旁，怆然泪下。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试图掩饰或克制悲怆，以致深知他性情的人感到惶恐。旅程在沉郁和痛苦的氛围中结束了。2月28日，罗斯福回到华盛顿。

3月1日，罗斯福出现在国会大厅。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迫坐着向议员们发表演说。他请求大家理解，并解释说，“这对于我要比不得不在我两条腿的下部带上差不多10磅钢架要方便的多；另外我刚从行程14000英里的旅程归来。”总统的容貌令在场的人震惊。当总统在谈到自己归来后顿感“精神振作，灵感丛生”时，大家早就一眼看出他“十分明显地健康恶化”：他吐词含糊不清，念讲稿时结结巴巴，时而停顿，时而插入一些无关的枝节问题；他的右手颤抖，艰难地用左手翻读讲稿；灰蓝色的眼睛有些迷朦，脸上肌肉松弛，背也有些驼。但是，当罗斯福在描述雅尔塔会议的成就、并要求国会接受“永久性的和平结构”——联合国时，激情使他的脸上重现光彩，语调激昂慷慨，往昔那种站在讲坛上的状态又恢复了，随即又消逝……

罗斯福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制订了一系列国内行动计划：引导美国实现从战时体制向平时时期的全面平稳过渡，遣散服役人员并向其提供充分的就业、培训和教育机会，协同各州在过渡时期提供适当的失业救济等多种社会保险，保持在私人品业制度下实现一揽子的经济权利法案，扩大美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要求制订未来的科学研究和发展计划，等等。”

这年3月，华盛顿天气异常的热。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堆满了等着总统办理的文件。白宫记者招待会如期举行，总统似又恢复了往日的敏捷与风趣。3月17日，白宫举行小型宴会，庆祝罗斯福夫妇结婚40周年。来自罗斯福家族故乡的荷兰朱丽安娜公主、荷兰大使夫妇在座。3月23日，罗斯福会见了将代表美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5位议员代表。他就雅尔塔会议上有关联大席位的协议问题侃侃而谈。当晚，他回到了海德公园。麦金太尔坚决要求总统休息一个较长的时期，埃莉诺也焦虑地抗议丈夫的固执。终于，罗斯福决定月底去佐治亚温泉作为期3周的疗养。在海德公园的几天中，罗斯福时常静坐窗前，眺望远处的牧场和赫德逊河水。他几乎每天都要去4年前落成的粗石图书馆，那里存放着他多年收藏的书籍和纪念品。饭后，他在他的房间里摆弄他的集邮册。他一生中收集了数十万枚邮票，每册的每页上都留有他的手迹。在罗斯福逝世一年后，这些邮票以25万美元的价格出手。

4月初的佐治亚温泉，莺飞草长，阳光明媚。早暖的气候下万物生机勃勃。山坡上的山茱萸、野紫萝兰和玫瑰花都已争妍怒放。置身于这里的罗

斯福似乎恢复得很快，他情绪开朗，兴致也好。这里的邻居在一棵老橡树下为总统举办一顿烤全猪的露天聚餐。尔后他就坐在那里观赏四周的景致。

每天都有邮件送来，里面主要是前日或当日的报纸以及需要总统批阅的文件。各大战场上捷报频传：攻占马尼拉市后的美军乘胜扩大战果，琉璜岛在3月底被克复。4月1日，规模浩大的冲绳岛会战开始，几乎绝望的日军旗死守护着日本本土的这最后一道屏障。4月11日，罗斯福从《亚特兰大宪章报》上看到这样的大字标题：第九集团军离柏林57英里，一日前进50英里，美俄两军可望早日会师。另一个标题是：150架超级空中堡垒白昼空袭东京。罗斯福盘算着，再过两周，50多个联合国家的代表们将齐集旧金山，宣告联合国的成立。他还知道，原子弹试爆即将进入最后的装配阶段。

这些天他总在考虑4月13日要发表的那篇演说稿。这是为纪念民主党的精神之父托马斯·杰斐逊诞辰202周年的集会而准备的，届时全国都将听到罗斯福从广播里传出的声音。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突出事态是：文明如果能够幸存，就必须培植或促进人类关系的科学——各种民族能够在同一地球和世界上和平地一平生活、一起工作的能力。”无疑，罗斯福已敏锐地预见到科学发展对人类文明与和平的双重意义，并对原子时代的到来怀着极大的隐忧。4月12日，他在演说稿的末尾加上了一句话：“我们要怀着坚强和积极的信念前进。”——这是罗斯福的生命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4月12日，温泉天气晴朗。罗斯福穿戴整齐，神定气闲地坐在扶手椅上，与露西·塞默尔、著名画家伊丽莎白·肖马托夫夫人和表亲劳拉·德拉诺谈天说地。下午1时，罗斯福系着哈佛红领带以摆好的姿势让画家为他画像，还不时拿过一份文件审阅。1刻钟后，他举手想捏一捏太阳穴，说：“我头疼得厉害。”说完手臂就垂了下来，头垂到了左胸前……

佐治亚时间3时35分，罗斯福经抢救无效，停止了呼吸。霍华德·布鲁恩医生诊断为脑溢血。25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如果当时有现在治这种高血压的药，如果总统戒烟且不再劳累过度的话，事情也许会有不同的结局。达特默思医学院的哈里·戈德史密斯博士认为，总统逝世时可能患有癌症。

正在华盛顿萨尔格拉夫俱乐部举办的年度茶会上的罗斯福夫人得知消息后，立即驱车赶回白宫。不久，“昏迷”的消息变成噩耗。埃莉诺给4个在海外服役的儿子发去电文：“亲受的孩子，父亲下午长眠。他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能尽职尽责到底。”政府各部的首脑齐集内阁会议厅，讨论紧急应付措施。下午5时47分，全美三大通讯社向海内外发出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的电讯。7点零9分，哈里·杜鲁门由首席大法官哈兰·斯通主持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33任总统，地点是白宫内阁会议室。

白宫外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其实没什么可看的，人们也没打算看到什么，他们只是默然伫立，若有所失而已。美国人停下了手中的活，脑子空洞而又茫然。岂不成声的人们不仅是在为引导了他们12年之久的总统哭泣，更是在为他们自己失却了这种依托后无法预期和把握的前途哭泣。林登·约翰逊（美国第36任总统）在国会山前泪雨滂沱，“他一直待我情同父子，他是我所知道的在任何时候都无所畏惧的人。上帝啊——他是怎样把我们所有人的担子全担在肩上的啊！”反对过罗斯福或与他有宿怨的人蓦然

发现，当一切顿成往事时，自己同总统隔得竟是如此之近！罗斯福在国会山上的强硬对手罗伯特·A·塔夫脱动情地说：“盖棺定论，他是个战时英雄，他为了美国人民，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度反对罗斯福的《纽约时报》发表如下社论：“正值强大而残忍的野蛮势力威胁着要蹂躏整个西方文明的时候，幸有罗斯福坐镇白宫。百年之后，人类也会因此俯伏而感激上帝。”

在唐宁街10号，丘吉尔感到“挨了一记重击”，感到一种深重的无法置换的损失降临了。几天后，首相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追悼仪式上失声痛哭。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神情黯然，他默默地“紧握着哈里曼大使的手约有30秒之久，还没有请他坐下。”随后，极度悲伤的元帅凝重而细致地询问总统去世前的情况。莫斯科红场下了半旗，旗帜围上了黑边。重庆的蒋介石起初怔怔地坐了很久，凄然无语，随即赶紧吩咐筹办悼念事宜。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以“民主巨星的陨落——悼罗斯福总统之丧”为题发表悼念社论。日本东京电台引述铃木首相的话：“我得承认，罗斯福确是领导有方，美军今日优势地位莫不有赖于他之领导。”

因此，他的去世对美国人民是个巨大损失，这点很可理解，我也深表同情。“东京电台随后特播几分钟哀乐以表示“对一位伟人去世的敬意”。罗斯福在1932年大选中说过：“请根据我的敌人的评论来评价我。”

载着灵柩的总统专列缓缓地翻山越岭北行。沿途露宿等候瞻仰灵车的人无以数计。车过亚特兰大，一群黑人女佃农跪在棉田里，双手紧攥，伸向灵车致哀。14日上午10时多，海军陆战队、坦克部队、陆军和各兵种的女兵护卫覆盖着黑丝绒和星条旗的灵车穿过华盛顿的街道。6匹白马拉着载有灵柩的炮车，车后是一匹孤独的乘马，戴着眼罩，马蹬倒悬，垂挂着一柄剑和马靴——象征勇士已撒手尘寰。肃穆的人群立在街道两旁。此情此景，令人们蓦然回想起沃尔特·惠特曼为80年前的几乎同一天的另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逝世所写的挽歌：

“灵柩经过大街小巷  
经过白天和黑夜，经过乌云低垂的大地  
卷起的旌旗排列成行，城市全蒙着黑纱，

……

这里，你缓缓走过的灵柩啊，  
我献给你我的紫丁香花枝。”

下午4时正，总统的祭奠仪式在白宫东大厅举行。代表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鲜花围满大厅四壁。罗斯福生前用过的轮椅，赫然摆放在祭坛的旁边。华盛顿教区的安格斯·邓恩大主教主持了简短的主教派葬仪，他在祈祷后的悼词中引用了罗斯福首次就职演说中的那句话——“我们唯一必须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会使我们变退却为前进的努力陷于瘫痪的那种无可名状的、缺乏理性的、毫无根据的恐惧。”主教说：“这是总统最初对我们讲的话，我确信他还希望把这作为他的最后遗言。”

杜鲁门总统走进东大厅时，人们忘记了起立。这种礼仪上的疏忽连杜鲁门自己也没意识到，“或者即使他注意到了，他也能理解在场的人还不能把他同他的崇高职位联想在一起；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是总统去世了。然而，当罗斯福夫人进来时，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有的人都退出东大厅，一袭黑纱的埃莉诺终于独自和丈夫呆在一起了，她胸前只佩着当初订婚时富兰

克林送给她的金质胸花，人们不知道她对丈夫讲了些什么，她最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轻抚了一下丈夫的脸颊，她把一束玫瑰放在灵柩里，于是灵柩从此封盖起来。

当晚，灵柩由专列送往海德公园。次日早上，载着灵柩的炮车和平乘沿着陡峭的山路攀援而上，到达罗斯福宅第所处的小山丘上。在那被高大的铁杉树和篱笆密密地围着的玫瑰园里，亲人、朋友、仆从和士兵们肃立在墓穴的四周。西点军校的学员组成的仪仗队，鸣枪向总统作最后的致敬。

上午10时许，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复归大地。四野萧索，六合暗然，赫德逊河水呜咽地流淌。墓地，神秘的哀乐如银匣泻地。人们的目光越过眼前的篱笆，可以看到那边草坪上一丛丛低矮的紫丁香树梢上，丁香花正寂寞地怒放。人们在心中又默诵起惠特曼那不朽的诗章——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

那颗硕大的星星在西天的夜空陨落了，  
我哀悼着，并将随着一年一度的春光永远这样。

……

在那里，在芬芳的松杉和朦胧阴暗的柏林深处，  
紫丁香，星星和小鸟和我心底的挽歌融在一起。”

